

# 印刷傳媒與宋詩之新變自得

## ——兼論唐人別集之雕印與宋詩之典範追尋

張高評\*

〔摘要〕

宋人面對「菁華極盛，體制大備」之唐詩典範，因應之道，在以學唐為手段，以通變為策略，盡心於「破體」，致力於「出位」，從事「會通化成」，講究「意新語工」，追求新變自得，期許自成一家。凡此，多與讀書萬卷，學問精博相互為用。宋人整理雕印杜甫、李白、韓愈、白居易、李商隱等唐代詩文集，以及陶淵明集，作為典範之觀摩與學唐變唐之觸媒；加上寫本藏本之流通，圖書信息之豐富多元，於是宋人從閱讀、接受、飽參，進而宗法、新變、自得，將傳承優良與開拓本色畢成功於一役。印刷傳媒之崛起，圖書流通之便捷，對於宋詩特色之生成，自有推波助瀾之效應。推而廣之，對於南宋以來張戒、嚴羽所斥「奇特解會」，明清宗唐詩話所譏「非詩」習氣，以及一切「唐宋詩之爭」課題；錢鍾書所提「詩分唐宋」說，乃至於日本內藤湖南所倡「唐宋變革」說，陳寅恪、傅樂成所謂宋型文化、文化造極云云，多可從宋代之雕版印刷切入，作為詮釋解讀之試金石。

關鍵詞：印刷傳媒、宋詩典範、學古通變、新變自得、唐詩別集總集

---

\*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中文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 一、宋代雕版印刷之繁榮與印本文化之形成

《後漢書》卷七十八〈蔡倫傳〉稱：蔡侯紙未發明之前，書寫工具「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基於傳播與文化目的，於是蔡倫改良造紙技術，而發明紙張。相較於縑帛與竹簡，紙張在書寫、閱讀、典藏、攜帶方面，有諸多「便於人」之傳播功能，於是天下「莫不從用」。<sup>1</sup>書籍之複製形式從手抄發展為雕版印刷，也是因應「便於人」之現實功能考量。

雕版印刷之發明，確切時代頗多爭議。據出土文物考證，日人藏有吐魯番所出《妙法蓮華經》一卷，當是現存世界最早之印刷品，學界斷為武則天（684-705）時代之雕版物，遠較敦煌發現之《金剛經》早一百多年。<sup>2</sup>至五代後唐時，宰相馮道奏請「校正九經，刻版印賣」，從此刻書不限於佛經日曆，官府提倡雕版，監本成為範式，印刷出版蔚為流行風尚。國子監以身作則，雕印精美圖書，「務廣其傳，不以求利」，發揮極大之推廣作用：

始置書庫監官，以京朝官充，掌印經史群書，以備朝廷宣索賜予之用及出鬻而收其直以上于官。（《宋史·職官五》）

曩以群書，鏤于方版，冀傳函夏，用廣師儒。期于向方，固靡言利。將使庠序之下，日集于青襟；區域之中，咸勤于素業。敦本抑末，不其盛歟！其國子監經書更不增價。（《宋大詔令集》卷一五〇，天禧元年九月癸亥；《全宋文》第六冊，卷二五五，宋真宗四四，〈國子監經書更不增價詔〉，頁714）

國子監所刊雕版圖書，「冀傳函夏，用廣師儒。期于向方，固靡言利」，以印本作

<sup>1</sup> 蔡倫發明紙之文獻記載，又見於《東觀漢記》卷十八〈蔡倫傳〉。參考劉光裕：〈論蔡倫發明「蔡侯紙」〉，《出版發行研究》2000年1、2期；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第一卷轉載（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0月），頁9-32。

<sup>2</sup> 長澤規矩也：《和漢書之印刷及其歷史》。另有南朝鮮慶州佛國寺發現漢譯本《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咒》，學界以為乃長安至天寶年間（704-751）之印刷品。兩者皆較斯坦因於敦煌發現唐咸通九年（868）之《金剛經》印刷品為早。參考程煥文編：《中國圖書論集》，查啟森：〈介紹有關書史研究之新發現與新觀點〉（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8月），頁57-59。

為傳媒，有「化身千萬，無遠弗屆」之效益，為「敦本抑末」，真宗下詔「國子監經書更不增價」。此一平準書價之詔示，對於雕版圖書在宋代之繁榮，自有影響。朝廷既提倡雕版圖書，於是上至國子監，下至州縣多有官刻本，其他又有坊刻本，家刻本之目。同時，稿本、抄本、寫本、傳錄本仍佔大多數。朝廷既實施右文，於是撰述繁多，琳琅滿目之撰著，不可能立即刊行，也不可能都交付雕印。書稿或抄本若無印本流傳，當然得「全仗抄本延其命脈」，「抄本之不可廢，其理甚為明白」。<sup>3</sup>要之，北宋之圖書流通，與知識傳播，關鍵在印本之崛起風行，與藏本寫本相輔相成，相互爭輝。北宋蘇軾〈李氏山房藏書記〉、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八，稍稍論述寫本藏本與印本刊本之消長，以及因此而衍生之閱讀態度轉變：

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蘇軾文集》卷十一，〈李氏山房藏書記〉）

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鑄六經版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鑄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減裂，然版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八）

中華雕版印刷大概源起於中唐，但以官府雕刻經典，印行天下，則始於五代後唐馮道。葉夢得稱：「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摹印之法」，徵諸敦煌漢文遺書，九成五以上多為寫本卷子，雕版印刷實物不多，可見葉氏之說大抵可信。蘇軾所謂老儒先生，手自抄書，日夜誦讀；又稱印刷圖書，「日傳萬紙，多且易致」，可見印本崛起之後，寫本藏本仍然並行不廢。對於雕版印刷作為圖書傳播之利器，

<sup>3</sup> 張舜徽：《中國古書版本研究》，〈抄本〉（臺北：民主出版社），頁 73-81。

蘇軾預期宋人之「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葉夢得關心印刷傳媒引發之「誦讀滅裂」、「版本不正」問題。印刷傳媒崛起，文學創作、學術風尚、閱讀心態、版本校讎諸相關課題，亦伴隨產生。印本圖書作為傳播媒介，筆者稱之為知識革命，職此之故。

書籍之傳播流通，中唐以前大多仰賴手寫謄抄。抄寫謄錄圖書，既耗時費事，故書價昂貴，又傳播不廣，動輒散佚。抄本、寫本、稿本在閱讀、保存、攜帶、典藏、書價、文化傳播方面，有諸多「不便於人」之困境，急待改善與突破。雕版印書發明，作為傳媒，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以為有「易成、難毀、節費、便藏」四大優點，於是，知識傳播產生革命性之轉變：因為圖書出版多元，發行數量龐大，不僅化身千萬，讀書容易，而且無遠弗屆，留存較多。抄寫本、雕印本作為圖書複製之手段，兩者在質量方面，有極大之懸殊：

兒子（過）到此（儋州），抄得《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欲抄。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蘇軾《蘇軾文集》卷五十五，〈與程秀才三首〉其三）

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後典籍，皆為板本。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版。……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沈括《夢溪筆談》卷十八，〈技藝〉）

忠憲公少年家貧，學書無紙。……時世間印板書絕少，多是手寫文字，每借人書，多得脫落舊書，必即錄甚詳，以備檢閱，蓋難再假故也。仍必如法縫粘，方繼得一觀，其艱苦如此。今子弟飽食放逸，印書足備，尚不能觀，良可愧恥。（張鎡《仕學規範》卷二，引《韓莊敏公遺事》）

抄錄謄寫，作為圖書複製之手段，其艱苦費時，誠如張鎡《仕學規範》所云，而蘇軾謫遷儋州，兒子蘇過手抄《唐書》、《漢書》，致喻為「窮兒暴富」，蓋就閱讀效益而言。鈔本之為圖書複製，與雕版、活字相較，數量、效益自然懸殊。沈括《夢溪筆談》所謂「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此雖論活字印刷，亦可移用作雕版印刷在數量與速率方面之優勢。

北宋開國以來，右文崇儒，科舉取士人數急遽暴增。論者稱：宋代科舉取士

之多，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士人通過科舉，獲取功名，進入仕途，改變身份。以北宋貢舉為例，「平均每年取士人數之多，在科舉史上是空前的，也是絕後的」。<sup>4</sup>博覽群書，有助於科舉及第，因此，科舉考試促成書院講學之風潮，影響閱讀接受之行為，助長雕版印刷之繁榮，圖書流通之便捷，知識信息之革命。真宗更下詔勸學，有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顏如玉」之言。蘇轍〈寄題蒲傳正學士閩中藏書閣〉所謂「讀破文章隨意得，學成富貴逼身來」，可見知識之神秘能量，與現實之榮顯利益，皆因印刷傳媒之崛起繁榮，而更加相得益彰。

太宗（939-997）注重訪求圖書，「遺編墜簡，宜在詢求」，「補正闕漏，用廣流布」。真宗（968-1022）時，「版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學者易得書籍」，「士大夫不勞力而家有舊典」，已見雕版印刷發達之便利。仁宗皇祐年間（1049-1054），圖書流通雖以寫本為主，然官方文化機構整理典籍，訪佚校勘，鏤版印行，推廣不遺餘力。靖康之難（1127），監本書版盡為金人劫掠毀棄。高宗紹興年間（1139-1151）下詔重刻經史群書，「監中闕書，次第鏤版」，於是雕版書逐漸成為公家藏書主體。論者指出，南宋為雕版印刷全面發展時期：中央和地方官府、書院、寺觀、私家、書坊，多有刻本。由於監本平準圖書價格，故印本較寫本價廉，書價約為寫本書十分之一而已。物美價廉之印本圖書，就商品經濟而言，尤其有利可圖。高宗紹興十七年（1147）刊刻《小畜集》30卷，每售出一部，即有233%之高利潤。《漢雋》全書凡十卷，每售出一部，利潤高達70%。圖書出版業既以低成本、高效率獲得利潤；因此能刺激買氣，活絡出版市場。<sup>5</sup>職是之故，宋代雕版數量之多，技藝之高，印本流傳範圍之廣，不僅是空前的，甚至有些方面明清兩代也很難與之相比。<sup>6</sup>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從藏書目錄考察南宋寫本書與刻本書之消長，略云：

後人一致認為《遂初堂書目》著錄了不同的刻本是一特點，並且開創了著

<sup>4</sup> 張希清：〈論宋代科舉取士之多與冗官問題〉，《北京大學學報》1987年第5期；又，〈北宋貢舉登科人數考〉，《國學研究》第二卷（1994年7月）。

<sup>5</sup> 曹之：《中國印刷術的起源》，〈宋代的書價〉（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3月），頁434-436；袁逸〈中國歷代書價考〉，《編輯之友》1993年2期。

<sup>6</sup> 宿白：《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南宋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3月），頁84。

錄版本的先例。但尤袤是以抄書著名的，而且在他的時代，刻本書的比量似乎還沒有超過寫本書。而且，《遂初堂書目》內記版本的僅限於九經、正史兩類。由於著錄簡單，連刻本的年月和地點都沒有表現出來。只有到了趙希弁和陳振孫的時代，刻本書超過了寫本書，他們對於刻本記載方才詳細。當然，尤袤的開始之功是應該肯定的。<sup>7</sup>

晁公武（約 1105-1180）《郡齋讀書志》、尤袤（1127-1194）《遂初堂書目》、趙希弁（1249 年在世）《郡齋讀書志·附志》、陳振孫（1183-1249）《直齋書錄解題》，為現存南宋四大私家藏書目錄。由四大藏書著錄觀之，南宋前期印本書以經史兩類為主，後期子集兩類急遽增加，集部激增尤著。<sup>8</sup>北宋元祐以來，寫本與印本互有消長，迨尤袤撰《遂初堂書目》時，刻本書之數量尚未超過寫本書；但至趙希弁及陳振孫著錄書目時，刻本書之數量已超過了寫本書。咸淳間（1265-1274），廖瑩中世綵堂校刻《九經》，取校 23 種版本，清一色為印本，無一寫本。從此之後，刻本書籍取代寫本，幾乎壟斷了圖書市場。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曾云：「凡書市中無刻本，則抄本價十倍；刻本一出，則抄本咸廢不售矣」，印本刻本之價廉物美，成為圖書傳播之寵愛，乃勢所必至，理有固然。不過，不是所有的書稿藏本都有印本，大凡「非讀者所急，好事家以備多聞」者，多為鈔錄之本，因此抄本藏本一直跟印本刻本並行流傳。抄本藏本之價值，有時並不亞於印本圖書。不過，寫本與印本之消長，影響圖書流通與知識傳播，這是可以斷言的。

藏本、寫本作為圖書傳播媒介，自東漢蔡侯紙作為書寫材料起，至近代善本複製，猶存此法。宋代雕版印刷繁榮，活字版印刷試行，作為圖書流通，更是「值得信賴」之有效傳播（Effective Communication）。宋代雕版印刷作為圖書傳播，相較於五代以前，自是一種創新之傳媒。印刷傳媒具有新的功能、新的速度、新的準則，勢必改變士人固有之思維、行為與習慣。<sup>9</sup>如何以優異之傳播性能，與廣大群眾之需求作完美之結合，乃是媒介傳播學永恆之課題。雕版印刷以「便於

<sup>7</sup> 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第三章第五節（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120。

<sup>8</sup> 同註 6，〈南宋刻本書的激增和刊書地點的擴展——限於四部目錄書的著錄〉，頁 105-110。

<sup>9</sup> 黃曉鐘、楊效宏、馮鋼主編：《傳播學關鍵術語釋讀》，〈媒介即訊息〉（The Media is the Message）（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 年 8 月），頁 43。

人」為主要目的，達成圖書流通之最佳效益，符合傳播學之理念，於是崛起、發展，漸漸印本取代寫本。雕版印刷之繁榮，加上寫本抄本與印本之並行，蔚為藏書文化之形成，上述圖書傳播方式的革新和多元，勢必影響閱讀接受之行為，更可能轉變創作審美之方向。<sup>10</sup>在宋代，圖書之典藏、教育之普及、科舉之取士、學術之風尚、文化之轉型，或多可能與雕版印刷之崛起息息相關。錢存訓評價印刷術之功能，曾言：「印刷術的普遍應用，被認為是宋代經典研究的復興，及改變學術和著述風尚的一種原因。」<sup>11</sup>與筆者管見，足以相發明。可惜此一課題，學界或專述印刷史，或專論版本學、文獻學，或專說圖書傳播，未有將上述專業研究與閱讀、接受、創作、批評作學科整合研究者，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此中頗值得關注。

就宋代而言，文化傳播之開展，其關鍵媒介在書籍之流通，抄書、印書、藏書、借書、購書，是知識藉以取得之途徑；而讀書、教書、著書、校書、刻書、販書，則為知識賴以流通傳播之環節。兩者相輔相乘，蔚為兩宋文明之輝煌燦爛。由此觀之，此一知識之革命，傳播之效應，對於學術文化必然帶來衝擊與影響。日本內藤虎次郎（1866-1934）提出「唐宋變革說」、「宋代近世說」；<sup>12</sup>陳寅恪、鄧廣銘推崇「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變，造極於趙宋之世」；「兩宋時期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sup>13</sup>乃至於傅樂成

<sup>10</sup>（法）弗雷德里克·巴比耶著，劉陽等譯：《書籍的歷史》，第二部分〈谷登堡的革命〉，第四章，3，「手抄業復興」略謂：谷登堡發明印刷術，使得15世紀中葉出現了「第一次圖書革命」；「主要反映在出版的圖書更多，發行人數更大。與此同時，社會藝術形式，文化興趣，也發生巨大變遷。」第六章，4，「閱讀」略謂：「活字印刷術從根本上改變了圖書生產的條件，及圖書的物質形態，同樣也改變了其適應環境。」「印刷術發明，基本上的影響，在於它帶來了書價的降低和書的相對平凡化。在文化實踐方面，由於閱讀實踐的改變，活字印刷術標誌著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的完結。」雖述說西洋活字印刷，亦可供東土雕版印刷之參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1月），頁88-89，頁132-134。

<sup>11</sup>錢存訓：《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第一章〈紙和印刷術對世界文明的貢獻〉，（四）「印刷術在中國社會和學術上的功能」（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頁356-358。

<sup>12</sup>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頁5-71；錢婉約：《內藤湖南研究》，第四章「宋代近世說」（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7月），頁96-122。

<sup>13</sup>陳寅恪：〈鄧廣銘《宋史職官考證·序》〉，《金明館叢稿》二編（臺北：里仁書局，1982年），頁245-246；鄧廣銘：〈宋代文化的高度發展與宋王朝的文化政策〉，《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162-171。

判分唐型文化、宋型文化；錢鍾書主張「詩分唐宋」；<sup>14</sup>筆者深信，其中促成變革、造極、空前絕後，分唐分宋之關鍵觸媒，當是雕版印刷之崛起，與寫本藏本爭輝，促成傳播、接受之雙向變革有以促成之。解讀上述「唐宋變革說」諸議題，學界尚未結合印本文化進行論述，值得嘗試。

## 二、厚積而薄發與宋詩之新變

### （一）熟讀博學與宋詩困境之突破

雕版印刷在宋代之繁榮昌盛，提供宋詩學唐變唐之便利和契機，盡心於求變，致力於追新，終而自成一家，與唐詩分庭抗禮，平分詩國之秋色。唐詩之輝煌燦爛，誠如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凡例》所謂「菁華極盛，體制大備」。因為「能事有止境，極詣難角奇」，所以，蔣士銓〈辯詩〉感歎「宋人生唐後，開闢真難為」。當年王安石身處北宋詩文革新之際，早已看清「世間好語言，已被老杜道盡；世間俗語言，已被樂天道盡」的困境；清翁方綱所謂：「天地之精英，風月之態度，山川之氣象，物類之神致，俱已為唐賢占盡」，亦同聲感慨宋詩生存發展之困窮。<sup>15</sup>

宋人面對唐詩之輝煌璀璨，大抵採行兩大因應策略：以學唐為手段，而以變唐為目的。學唐，即是模仿、繼承、接受、汲取唐詩之優良傳統；變唐，卻是自覺的刻意轉化、修正、調整唐詩建構之典範與本色，從事更新、重寫、創造，遂形成宋詩特色之風格。大抵宋代詩人多有布魯姆（Harold Bloom，1930-）所謂之「影響的焦慮」（The Anxiety of Influence），既接受唐詩，又挑戰唐詩；既受其影響，又思脫穎而出，取得獨立性、創造性。「渴求中斷前驅詩人永無止境的影響，以代替前驅詩人而彰名於世」，<sup>16</sup>宋詩之學古通變，期許自成一家近似之。

<sup>14</sup>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7年9月），頁339-382；錢鍾書：《談藝錄》，一、〈詩分唐宋〉（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88年11月），頁1-5。

<sup>15</sup> 《陳輔之詩話》引王安石語，《宋詩話輯佚》本（臺北：文泉閣出版社，1972年4月）；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十四（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年12月），頁90。翁方綱：《石洲詩話》卷四，《清詩話續編》本（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12月），頁1428。

<sup>16</sup> 哈羅德·布魯姆著，徐文博譯，《影響的焦慮》（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頁11，頁57-72。參考金元浦《接受反應文論》，第八章第三節〈布魯姆：誤讀與焦慮〉（濟南：山東教育出版



宋人致力學古通變，期許自成一家，其終極成就果然疏遠了唐詩之本色，逆轉了唐人建構之詩歌語言，蔚為「詩分唐宋」之局面，所謂「唐音」與「宋調」者是。<sup>17</sup>宋詩所以能逆轉唐詩影響，取而代之，而別子為宗，平分詩國之秋色者，宋王朝「擴大科舉名額，以及大量刻印書籍等」所謂「右文政策」，<sup>18</sup>是其中之推手與助力。由於右文政策之實施，教育普及，朝野上下讀書蔚為風氣，所謂「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路逢十客九青衿」，「城裡人家半讀書」。在所謂「右文政策」下，宋人作詩自然關切到讀書與博學。由於雕版圖書之崛起，形成印本文化，與寫本文化、藏書文化相互輝映，促成宋代士人認同：讀書博學有助於作詩作文，蘇軾所謂「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尤具有代表意義：

盍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蘇軾《蘇軾文集》卷十，〈稼說送張琥〉）

頃歲孫莘老識歐陽公，嘗乘間以文字問之。云：「無他術，唯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蘇軾《蘇軾文集》卷六十六，〈記歐陽公論文〉）

王庠應制舉時，問讀書之法於眉山，眉山以書答云：「……卑意欲少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書之富如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盡取，但得其所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此雖似迂鈍，而他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也。……前輩教人讀書如此，此豈膚淺求速成，苟簡無根柢者所能哉！」（沈作喆《寓簡》卷八，《四庫全書》本 864-156）

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為宋人提倡讀書

社，1998年10月），頁306-314。

<sup>17</sup> 錢鍾書：《談藝錄》，〈詩分唐宋〉（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88年11月），頁1-5。

<sup>18</sup> 陳植鏗：《北宋文化史述論》，鄧廣銘〈序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3月），頁6。

有益於作文所遵奉之名言；蘇軾發皇其說，以美稼、流水、發箭為喻，而稱：「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博觀，指閱讀對象之廣博多元；厚積，指學問涵養之積累豐厚。博觀泛覽，而有別識心裁，是謂「約取」；學養豐厚，而作慎微之發用，是謂「薄發」，可見積學儲寶，讀書有益於作文。歐陽脩稱作文：「無他術，唯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亦是同理。至於蘇軾答王庠書，提出「八面受敵」讀書法，所謂「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每次作一意求之」，講究深植根柢，不求速成，亦是「博觀、厚積」之精神。

宋代士人閱讀圖書，除傳統之寫本、藏本外，又有價廉、物美、悅目、便藏之印本書籍，圖書資訊豐富而多元，對於閱讀、接受、詩思、創作之間，較之唐代，遂有顯著不同。宋代詩人自歐陽脩、王安石、蘇軾、黃庭堅，多主張勤讀、熟讀、博學、遍參，儲備精博之詩材，以資助創作表述，如：

有問荊公：老杜詩何故妙絕古今？公曰：老杜固嘗言之：「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魏慶之《詩人玉屑》卷十四，引《東臯雜錄》）

僕嘗悔其少作矣，然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所悔。當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儲其材用，既足，而後成之，然後為得也。（蘇軾《蘇軾文集》卷五十三，〈與張嘉父七首〉其七）

所送新詩皆興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爾。「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不虛語也。（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卷十九，〈與王觀復書〉其一）

讀書不虛，用日多，得古人著意處，文章雄奇，能轉古語為我家物。（黃庭堅《沈氏三先生集·雲巢集》卷八，〈雲巢詩序〉）

王安石標榜杜甫〈戲為六絕句〉：「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蘇軾強調「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黃庭堅提倡讀書精博，得古人著意處，能轉古語為我家物，所謂「長袖善舞，多錢善賈」；劉辰翁評黃庭堅詩：「矯然特出新意，真欲盡用萬卷，與李杜爭能於一辭一字之頃」，<sup>19</sup>讀書萬卷與作詩「特出新意」間，自

<sup>19</sup> 劉辰翁：《增廣箋註簡齋詩集》卷首，《四部叢刊》影宋本，白敦仁：《陳與義校箋》附錄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8月），頁1016。

有相得益彰之效應。清翁方綱《石洲詩話》卷四稱：「宋人精詣，全在刻抉入裡，而皆從各自獨書學古中來，所以不蹈襲唐人」，此之謂乎！要之，諸家之說皆以為勤讀書，學問精博，有助於詩材之儲備，詩思之處發。

嚴羽《滄浪詩話》，說詩宗尚盛唐，主張興趣、妙悟，其論作詩工夫，強調「須從上做下」，亦不離「熟讀」與「遍參」、「熟參」；與蘇軾「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異曲同工：

工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先須熟讀《楚詞》，朝夕諷詠以為之本；及讀《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李陵蘇武漢魏五言，皆須熟讀，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然後博取盛唐名家，醞釀胸中，久之自然悟入。（嚴羽《滄浪詩話·詩辨》）

惟悟乃為當行，當為本色。詩道如是也。若以為不然，則是見詩之不廣，參詩之不熟耳。試取漢魏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晉宋之詩而熟參之，次取南北朝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沈、宋、王、楊、盧、駱、陳石遺之詩而熟參之，次取開元天寶諸家之詩而熟參之，次獨取李杜二公之詩而熟參之，又取大曆十才子之詩而熟參之，又取元和之詩而熟參之，又盡取晚唐之詩而熟參之，又取本朝蘇、黃以下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隱者。（同上）

嚴羽《滄浪詩話·詩辨》標榜妙悟、興趣，雖稱：「詩有別裁，非關書也」，而轉語卻云：「然非多讀書，則不能極其至」，則主「羚羊掛角，無跡可尋」之嚴羽，亦認同「厚積而薄發」。試觀嚴羽之學古論，在熟讀古代優秀作品，熟參、遍參漢魏六朝古詩，初、盛、中、晚唐詩，及宋代蘇軾、黃庭堅諸家詩，辨識體製家數，熟悉流派與作品，經過鑽研體會，「醞釀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詩藝之真是真非，由熟讀而遍參而熟參，經漸修，終而妙悟。此即韓駒〈贈趙伯魚〉詩所謂：「學者當如初學禪，未悟且遍參諸方。一朝悟罷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與蘇軾之「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相較：熟讀、遍參與博觀、厚積之功夫相近，熟參、妙悟與約取、薄發之境界相當。

## (二) 博觀約取與宋詩之豁徑別關

黃宗羲《明儒學案·自序》稱：「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然多讀書，當為詩用，不作詩累，庶幾開卷有益。否則，豐富圖書只供詩人擣糝獮祭、蹈襲剽掠，不能去陳、化變、出新、入妙，是亦枉然。雕版印書、右文政策之施行，閱讀態度、創作風格亦隨之改觀。宋代士人面對「宋人生唐後，開闢真難為」之困境，大家名家紛紛發言，分別留心於詩思、命意、語言、學養之講究；尤其針對唐詩所建構之敘述視角、描述過程、時空關係、語言形式，<sup>20</sup>經由多讀書而博觀約取，而厚積薄發，而轉化新變，在在提示文學生存發展之道，如梅堯臣、歐陽脩、王安石、蘇軾、黃庭堅諸代表詩人所提示「會通化成」之道，以及「意新語工」之方，要皆以求異思維、創意造語為依歸，如：

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於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海，有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蘇軾《蘇軾文集》卷六十三，〈祭龍井辯才文〉，p.1961）  
物一理也，通其意，則無適而不可。分科而醫，醫之衰也；占色而畫，畫之陋也。（同上，卷六十九，〈跋君謨飛白〉）

聖俞嘗語余曰：「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歐陽脩《六一詩話》）

本朝詩人與唐世相抗，其所得各不同，而俱自有妙處，不必相蹈襲也。至山谷之詩，清新奇峭，頗造前人未嘗道處，自為一家。此其妙也。（陳巖肖《庚溪詩話》）

（宋詩）至王介甫創撰新調，唐人格調始一大變。蘇、黃繼起，古法蕩然。

（胡應麟《詩藝》外編卷五）

理一分殊，為宋代思想之核心論題；會通化成，為宋型文化特色之一。細考之，自亦體現於宋詩之創作與評論中。<sup>21</sup>觀東坡之說，所謂「江河雖殊，其至則同」；

<sup>20</sup> 葛兆光：《漢字的魔方》，七、〈從古典詩到現代詩：詩歌語言的再度轉變〉，（一）以文為詩，從唐詩到宋詩（香港：中華書局，1989年12月），頁205-226。

<sup>21</sup> 張高評：《會通化成與宋代詩學》，〈從會通化成論宋詩之新變與價值〉，四、「理一分殊」與宋

所謂「物一理也，通其意則無適而不可」，此理一分殊，會通化成之說也。詩、文、賦、詞、畫、禪，既為宋代文化之「雜然賦流形」，自然容易會通化成，而有以文為詩、以賦為詩、以詞為詩、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以禪為詩諸文藝現象。宋詩之體質，經過異類之融入、互補、改造，於是化變、生新，蔚為殊異於唐詩本色之體格。上述系列合併重組、會通化成之歷程，頗似異場域碰撞(Breakthrough Insight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Idea, Concept and Cultures)，暗合梅迪奇效應(The Medici Effect)：會通、組合、求異、創新，是其思維策略；其效應在跳脫單一、慣性、本色、當行之聯想障礙，而有變異、新奇、創造、發明之觀。<sup>22</sup>明胡應麟《詩藪》所謂「創撰新調」、「格調大變」，所謂「古法蕩然」，即是「求異」、「創造」諸詩思之發用，其中自有圖書流通、印本激盪，所引起之反思、應變、轉化、超越在。《六一詩話》標榜梅堯臣「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之說，《庚溪詩話》強調「本朝詩人與唐世相抗，其所得各不同，而俱自有妙處，不必相蹈襲也。」可見宋詩求異與創新思維之一斑。

追求意新語工，留心「古人不到處」之詩意，創作「古今不經人道」之詩語，是宋詩大家名家面對唐詩輝煌之應變與作為。宋人之困境，在突破唐詩之規矩，跳脫唐詩之方圓；苕溪漁隱胡仔所謂：「若循習陳言，規摹舊作，不能變化，自出新意，亦何以名家？」堪稱宋詩創作與批評之共同課題。其中之規矩方圓、陳言舊作，即是前代或當代詩人之優長與典範，經由圖書傳播、閱讀接受形成規矩準繩，詩人既厭棄陳窠，擺脫匡架，於是由此而生發、轉化，而創意、造語、而作古今新變。如：

唐詩：「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又曰：「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  
舒王東坡用其意，作古今不經人道語。舒王詩曰：「木末北山煙冉冉，草根南澗水泠泠。縑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坡曰：「桑疇雨過

詩之會通化成，(臺南：成功大學出版組，2000年8月)，頁27-37。學界研究儒學，亦獲致相近之論點，如石訓、楊翰卿等：《宋代儒學與現代東亞文明》，第四章第三節〈整體思維，群體意識〉，第五節〈開放兼容、融會創新〉(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頁113-130；頁148-161。

<sup>22</sup> Frans Johansson 著，劉真如譯：《梅迪奇效應》，第二篇〈創造梅迪奇效應〉(臺北：商周出版社，2005年10月)，頁52-145。

羅紈膩，麥隴風來餅餌香。」如《華嚴經》舉果知因，譬如蓮花，方其吐花而果具蕊中。造語之工，至於舒王東坡山谷，盡古今之變。（釋惠洪《冷齋夜話》卷五，彭乘《墨客揮犀》卷八）

意匠如神變化生，筆端有力任縱橫。須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隨人腳後行。（戴復古《石屏詩集》卷七，〈論詩十絕〉其四）

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架層，信然。陸機曰：「謝朝花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為文之要。苕溪漁隱曰：學詩亦然，若循習陳言，規摹舊作，不能變化，自出新意，亦何以名家？魯直詩云：「隨人作計終後人。」又云：「文章最忌隨人後。」誠至論也。（魏慶之《詩人玉屑》卷五）

山谷云：「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窺入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釋惠洪《冷齋夜話》卷一）

古之能為文章，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卷十九，〈答洪駒父書〉三首其二）

考察《冷齋夜話》、《墨客揮犀》、《苕溪漁隱叢話》、戴復古〈論詩十絕〉、《詩人玉屑》，大抵以唐詩或先唐詩作為對照系統，如所謂循習陳言，規摹舊作、隨人作計、不能變化、隨人腳後行云云；又如自出新意、不經人道、盡古今之變、自名一家、自我胸中出云云，其中自以唐詩之本色與典範為參照系統。宋人面對唐詩之高峰，消極工夫是「不肯雷同剿襲，拾他人殘唾，死前人語下」；積極策略是「處窮必變」、「自出手眼，各為機局」。其策略多方，要以追新求變，自成一家為依歸。宋代詩學之課題，如點鐵成金、奪胎換骨、以故為新、化俗為雅，以及提倡句法、捷法，標榜活法、透脫，體現翻案、破體、出位諸現象，大抵多以傳承繼往優長為手段，而以開來拓新自家風格為極致，一舉而解決承繼傳統和建立本色之雙重使命。上述宋代詩學議題，無論繼承傳統，或開拓新變，無不以圖書傳播為前提，知識革命為手段。因為宋代詩學課題所謂雷同、剿襲、他人殘唾、

前人語下、鐵、胎、故、俗，以及相對應之死法、辨體、本位，其參照系統為唐詩，即是激盪宋人追新求變，自成一家之古典詩歌本色與典範。若圖書流通不廣，知識傳播不暢，何所依傍憑據而求變、而追新？

宋代雕版印刷崛起，與寫本爭輝，宋代詩人為汲取古人之優長，建構自家特色，故作詩主張博觀厚積，讀書詩之寫作，讀書法之講究，蔚為一代風尚。<sup>23</sup>蘇過在儋州，曾手抄《唐書》、《前漢書》，蘇軾曾謂：「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sup>24</sup>蓋手鈔默識，經幾番注意，有助於融貫記憶故也。何況印本圖書價廉、便藏，得之容易，讀之或生吞活剝，或未經熟讀妙悟，故其失或流於資書以為詩，以學問為詩。為避免此病，宋人乃標榜不蹈陳跡、不為不襲，追求自出己意、別闢蹊徑，此非有厚積薄發、熟參妙悟之工夫不可，如：

齊梁以來，文士喜為樂府辭，然沿襲之久，往往失其命題本意。……惟老杜〈兵車行〉、〈悲青坂〉、〈無家別〉等數篇，皆因事自出己意，立題略不更蹈前人陳跡，真豪傑也。（蔡啟《蔡寬夫詩話·樂府辭》，《宋詩話輯佚》本，劉風誥《杜工部詩話》引此作蔡條語）

至於詩，則山谷倡之，自為一家，並不蹈古人町畦。象山云：「豫章之詩，包含欲無外，搜抉欲無秘，體制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夫精到。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於世若此者，如優鉢曇華，時一現耳。」楊東山嘗謂余云：「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制行，作文亦然。如歐公之文，山谷之詩，皆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者也。（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三）元祐詩人詩，既不為楊、劉崑體，亦不為九僧晚唐體，又不為白樂天體，各以才力雄於詩。山谷之奇，有崑體之變，而不襲其組織。（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一〈雪類·詠雪奉呈廣平公〉評語）

《蔡寬夫詩話》推崇杜甫〈兵車行〉等樂府詩，「皆因事自出己意，立題略不更

<sup>23</sup> 張高評：〈北宋讀詩詩與宋代詩學——從傳播與接受之視角切入〉，將刊載於《漢學研究》第廿四卷第二期（2006年12月）。

<sup>24</sup> 蘇軾：《蘇軾文集》卷五十五，〈與程秀才三首〉其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629。

蹈前人陳跡」；羅大經《鶴林玉露》稱揚黃庭堅詩，謂其「自為一家，並不蹈古人叮咛」；又引楊萬里之說，證成山谷詩「不向如來行處行」。案：上列論述所謂前人陳跡、古人叮咛、如來行處，概指圖書所載名篇佳作之典範或優長而言，閱讀學習，作為反思創發之資助可也，若「循習陳言，規摹舊作、不能變化、自出新意」，則非宋代詩人學古之初衷。試觀方回《瀛奎律髓》評述元祐詩人詩：「既不為楊、劉崑體，亦不為九僧晚唐體，又不為白樂天體」，此三「不為」，即是各體派之詩學典範與陳跡叮咛。黃庭堅等元祐詩人之雄奇，即在「變而不襲」、「自為一家」，此楊萬里所謂「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實則，此乃「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之閱讀接受歷程，亦是文學創作「窮變通久」之因應原則，宋人探討頗多。當別撰一文，以探蹟索隱。

肇始於南北宋之際之唐宋詩紛爭，歷明代前後七子、清初宗唐宗宋之對話，至葉燮(1627-1703)《原詩》、翁方綱(1733-1818)《石洲詩話》、朱庭珍(1841-1923)《筱園詩話》，對於宋詩之優長與特色，有較明確之提示。夷考其實，亦多與印刷傳媒之效應、圖書傳播之反饋有關，如云：

愈嘗自謂陳言之務去，……故晚唐詩人亦以陳言為病，……至於宋人之心手，日益以啟，縱橫鉤致，發揮無餘蘊，非故好為穿鑿也。譬之石中有寶，不穿之鑿之，則寶不出。(葉燮《原詩》卷一，〈內篇上〉，《清詩話》本)  
宋人精詣，全在刻抉入裏，而皆從各自讀書學古中來，所以不蹈襲唐人也。……唐詩妙境在虛處，宋詩妙境在實處。……宋人之學，全在研理日精，觀書日富，因而論事日密。(翁方綱《石洲詩話》卷四，《清詩話續編》本)

宋人承唐人之後，而能不襲唐賢衣冠面目，別闢門戶，獨樹壁壘，其才力學術，自非後世所及。如蘇黃二公，可謂一朝大家，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也；半山、歐公、放翁亦皆一代作手，自有面目，不傍前賢籬下。(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二)

葉燮推崇宋人縱橫鉤致，穿鑿發揮；翁方綱稱讚宋人刻抉入裏，不襲唐人，其說同歸一揆，要「皆從各自讀書學古中來」。宋人「研理日精，觀書日富」，此與寫



本、藏本之閱讀流通，印刷圖書作為新興而值得仰賴之傳媒有關。朱庭珍肯定蘇、黃、王、歐、陸諸大家「自有面目，不傍前賢籬下」；又推崇宋人承唐人之後，「不襲唐賢衣冠面目，別闢門戶，獨樹壁壘」。凡此，多以唐詩名家名篇作為對照標準；如果宋人未整理刊行唐人詩文集，印刷傳媒不如是之繁榮，只仰賴藏本之傳鈔、寫本之流通，圖書資訊既封閉難得，借鏡參考無從，宋人詩歌將是另一番局面與風格。

### （三）知入知出與宋詩之新變自得

印本圖書之快捷便利，有助於知識傳播，加上寫本、藏本圖書之資訊流通，宋人之閱讀接受、詩思詩作，遂不得受影響。尤其面對唐詩大家名家之輝煌成就，經圖書閱讀、反思內省，宋人遂盡心於「破體」，致力於「出位」，以「會通化成」為策略，以「意新語工」為效應。關切創造造語，其求異思維體現為別闢徑、獨具隻眼；不經人道，古所未有。<sup>25</sup>其途徑為多讀書，學問精博；出入眾作，嫻熟古人之氣格、法度、句法、詩律，方能變而不襲，自得成家。如下列筆記詩話所云：

《雪浪齋日記》云：「為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照、謝靈運；渾成而有正史以來風氣，當看淵明；欲清深閑淡，當看韋蘇州、柳子厚、孟浩然、王摩詰、賈長江；欲氣格豪逸，當看退之、李白；欲法度備足，當看杜子美；欲知詩之源流，當看《三百篇》及《楚辭》、漢、魏等詩。前輩云：『建安方六七子，開元數兩三人。』前輩所取，其難如此。予嘗與能詩者論書止於晉，而詩止於唐。蓋唐自大歷以來，詩人無不可觀者，特晚唐氣象衰爾耳。」（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何汶《竹莊詩話》卷一）

看詩且以數家為率，以杜為正經，餘為兼經也。如小杜、韋蘇州、王維、太白、退之、子厚、坡、谷、四學士之類也。如貫串出入諸家之詩，與諸體俱化，便自成一家，而諸體俱備。若只守一家，則無變態，雖千百首，

<sup>25</sup> 張高評：《宋詩之新變與代雄》，貳、〈自成一家與宋詩特色〉，第二節〈宋人期許獨創成就〉，第三節〈宋詩追求自成一家〉（臺北：洪葉文化公司，1995年9月），頁68-137。

皆只一體耳。(吳可《藏海詩話》，《歷代詩話續編》本)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刊行於紹興十八年(1148)，何汶《竹莊詩話》成書於開禧二年(1206年)。雕版圖書在南宋，始則與寫本競秀爭妍，中則平分秋色，終至取代寫本，而壟斷圖書傳播市場。觀《雪浪齋日記》所云「為詩與看書」之論述，所謂「建安方六七子，開元數兩三人」；「唐自大歷以來，詩人無不可觀者」，可見宋人博觀約取之一斑。呂本中(1084-1145)《童蒙詩訓》稱：「遍考精取，悉為吾用，則姿態橫出，不窘一律」；吳可(?-1119-1174-?)《藏海詩話》亦稱：「如貫穿出入諸家之詩，與諸體俱化，便自成一家，而諸體俱備」；凡此，皆與東坡「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之說異曲同工。要之，其要多歸於杜甫「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之說。惟讀書萬卷與下筆有神間，關鍵環節在自得自到，自成一家，如云：

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其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法。蓋不能入得書，則不知古人用心處；不能出得書，則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乃盡讀書之法。(陳善《門蟲新話》上集卷四)

《西清詩話》云：「作詩者，陶冶物情，體會光景，必貴乎自得；蓋格有高下，才有分限，不可強力至也。」(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六)

大凡文字須是自得自到，不可隨人轉也。(張鎡《詩學規範》卷十四)  
不蹈襲最難，必有異稟絕識，融會古今文字於胸中，而灑然自出一機軸方可。不然則雖臨紙雕鏤，只益為下耳。(吳氏《林下偶談》卷三，《叢書集成》本)

文章自得方為貴，衣鉢相傳豈是真。已覺祖師低一着，紛紛法嗣復何人？  
(金王若虛〈論詩詩〉，《滄南遺老集》卷四十五，《叢書集成》本)

詩吟函得到自清有得處，如化工生物，千花萬草，不名一物一態。若模勒前人，無自得，只如世間剪裁諸花，見一件樣，只做得一件也。(《詩人玉屑》卷十引《漫齋語錄》)

圖書傳播多元，資訊接受豐富，詩人以書卷為詩材，最易流於規摹舊作，循習陳言，蹈襲前人，模擬典範，如此隨人作計，不知變態，勢必死於句下，而失其所以為詩。宋代詩人無不學古，亦無不博覽精讀古書，蓋藉此為手段，以擷取傳統精華，而增益其所不能。陳善《門蟲新話》上集卷四強調「讀書須知出入法」，所謂「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法」，惟能入能出，方稱自得自到。宋代詩話、筆記、詩文集如《西清詩話》、《苕溪漁隱叢話》、《詩學規範》、《漫齋語錄》、《詩人玉屑》以及王若虛〈論詩詩〉，多極力標榜自得自到，自出機軸，而以蹈襲、雕鏤，模勒前人為鑑戒。筆者以為，宋詩從學古通變，到求異、創新，到自得自到，以至於自成一派，除文學自身之演化外，雕版印刷、圖書傳播所引發之效應，當是詩分唐宋、唐宋變革之關鍵因素。前引錢存訓之說，以為「印刷術的普遍應用，被認為是改變學術和著述的一種原因」，筆者深以為然。

宋詩於唐詩之後，能自得自作，自成一派，因而文學史有宋詩、宋調，蓋別子為宗，可與唐詩、唐音相提並論。此一分野，與宋代印刷術之繁榮有關，已如上述。宋代詩風之新變代雄，明清詩論家多有洞見與提示：明袁中道考察宋人之詩歌創作，得出宋人面對困境，所作消極與積極的因應之道，以及解決良方；清袁枚、蔣士銓諸家，則肯定「唐宋皆偉人，各成一派詩」。關於宋詩之特色與價值，袁枚提出學唐變唐，蔣士銓以為「變出不得已」，朱庭珍特提「別闢門戶，獨樹壁壘」：

宋元承三唐之後，殫工極巧，天地之英華，幾洩盡無餘。為詩者處窮而必變之地，寧各自出手眼，各為機局，以達其意所欲言，終不肯雷同剿襲，拾他人殘唾，死前人語下。於是乎情窮，而遂無所不寫；景窮，而遂無所不收。（袁中道《珂雪齋文集》卷十一，〈宋元詩序〉）

唐人學漢魏，變漢魏；宋學唐，變唐。其變也，非有心於變也，乃不得不變也；使不變，不足以為唐，亦不足以為宋也。……變唐詩者，宋元也；然學唐詩者莫善於宋元，莫不善於明七子，何也？當變而變，其相傳者心也；當變而不變，其拘守者跡也。（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七，〈答沈大宗伯論詩書〉）

唐宋皆偉人，各成一派詩。變出不得已，運會實迫之。格調苟相襲，焉用

雷同詞？宋人生唐後，開闢真難為。一代只數人，餘子故多庇。敦厚旨則同，忠孝無改移。元明不能變，非僅氣力衰；能事有止境，極詣難角奇。  
（蔣士銓《忠雅堂詩集》卷十三，〈辨詩〉）

袁中道、袁枚、蔣士銓論宋詩，異口同聲凸顯「變」字，既論定宋詩之歷史地位，亦作為詩分唐宋之權衡，與清初宗宋詩派持「新變」論詩，可謂前後一揆。<sup>26</sup>蔣士銓〈辨詩〉稱：「宋人生唐後，開闢真難為」，「能事有止境，極詣難角奇」，宋人困境在「處窮而必變」，深知「變出不得已」，於是「各自出手眼，各為機局」，「終不肯雷同剿襲，拾他人殘唾，死前人語下」，袁枚所謂「宋學唐，變唐」，宋人富有競爭精神，表現超勝意識有以致之。宋代雕版印刷當令，因此，「宋人之學，全在研理日精，觀書日富」，影響所及，宋詩所作傳承與開拓，會通與化成，往往如陸機《文賦》所謂「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遂初賦〉所謂「擬遺跡以成規，詠新曲於故聲」，因長於推陳出新，遂能自成一家、新變而代雄。

雕版印刷之繁榮，藏本寫本之相互爭輝，蔚為知識傳播之便捷，詩人隨心所欲閱讀接受大量信息，讀書破萬卷成為可能，宋人講求知入知出，期許自得自到，盡心求異創造，致力會通化成，自然改變文學的創作風格，如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以文為詩、以賦為詩、以詞為詩等合併重組之文學體制。宋人追求此類「非詩」之詩思，其實深具獨到與創發性，與創造思維（Creative Thinking）注重反常、辯證、開放、獨創、能動性，<sup>27</sup>可以相互發明。文學批評之風尚和類型，亦因印本文化之繁榮、圖書傳播之推助而轉向，如主張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以故為新、傳神、天工、清新、枯澹、活法、透脫、翻案、自得、破體、出位等等，於宋詩代表性之體派與作品中，亦多有所表現。由此觀之，雕版印刷、圖書傳播，與宋詩特色之形成、宋代詩學之宗尚，關係密切，不可分割。

雕版印刷大盛於真宗朝，而宋詩特色之形成大抵在哲宗元祐（1086-1094）前後；南宋高宗紹興（1131-1162）年間，刊本與寫本相互爭輝，晁公武《郡齋

<sup>26</sup> 張高評：〈清初宋詩學與唐宋詩學之異同〉，第三屆國際暨第八屆《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貳、一、標榜新變的風格（高雄：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中心，2004年7月），頁93-105。

<sup>27</sup> 田運主編：《思維辭典》，〈創造性思維轉換〉、〈創造思維〉（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204-205、207-208。

讀書志》、尤袤《遂初堂書目》可以考見。至理宗淳祐（1241-1252）年間，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成書時，刻本已超過寫本。由此可見，宋人圖書流通，除寫本、鈔本、藏本外，印本傳播之質量最值得重視。筆者以為，唐宋詩紛爭興起於南北宋之交，至南宋而愈演愈烈，當與寫本印本之消長，印本文化之激盪、宋詩特色之形成有關。圖書雕印，得之容易，讀之苟簡，於是讀書法之講究、讀書詩之蠶起、唱和詩之競作、詩話筆記之編印、學古通變之覺悟，乃至於詩思、詩材之由直尋變為「補假」；論著風尚從「述」轉向「作」；詩歌詩學亦從學古傳承，走向自得創發，凡此多受讀書博學之影響而使然。

南宋後之唐宋詩紛爭，初始只斤斤於分體劃派，往往為左右袒，其後或因源流、異同而定優劣高下；或持本色、典範而軒輊唐宋。試考察宋、明、清之詩話、筆記、文集、序跋，即可見諸家所論唐詩宋詩之短長，更可見唐音、宋調之取捨與消長。其中關鍵性之分野，即是雕版印刷之影響、圖書傳播之推助。

為辨章學術，考鏡淵流，筆者曾撰有〈清初宗唐詩話與唐宋詩之爭〉一文，<sup>28</sup>選擇清初賀裳、吳喬、馮班、施閏章、王夫之、毛先舒、毛奇齡、王士禛、何世璠、田同之等十家宗唐詩話，約 60 餘條資料作為文本，從文學語言、詩歌語言之觀點切入，以考察宗唐詩話評論宋詩、宋調、宋人之是非曲直，廓清其疑似，期能還原宋詩宋調之價值真相，且為唐宋詩之爭提供另類之新異視角。初步探討，獲得下列結論：宋詩之變異與陌生化，自得與創發性，筆者以為，多與印刷傳媒、圖書傳播所衍生之效應有關：

變異與陌生化：宗唐詩話論宋詩之習氣，如出奇、務離、趨異、去遠、矜新、變革、疏硬、如生、尖巧、詭特、粗硬槎牙、奪胎換骨等等，諸般「不是」，就「菁華極盛，體製大備」之唐詩而言，固是易、變、遠、新的一種手段，亦即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 1893-1984）、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 1896-1982）、姚斯（Hans-Robert Jauss 1921-）等學者所倡，具有「陌生化美感」（Defamiliarization）之詩歌語言。

自得與創發性：宗唐詩話針對蘇黃詩風與江西詩派，大加撻伐者，為與唐

<sup>28</sup> 張高評：〈清初宗唐詩話與唐宋詩之爭——以「宋詩得失論」為考察重點〉，《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學刊》第 1 期（臺北：學生書局，2002 年 6 月），頁 83-158。

詩、唐音趣味不同之「非詩」特色，如以文為詩、以詞為詩、以賦為詩、以史入詩、以禪喻詩、以禪為詩、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資書以為詩，以及「反其意而用之」的翻案詩。這些特色，唐代詩人如杜甫、韓愈、及晚唐詩人中隱含宋調者間亦為之，不過論特色遠不如宋人與宋詩。

由此觀之，就是這種「皮毛剝落盡」的陌生化，「出人意表」的新鮮感，「著意與人遠」的奇異性，以及「挺拔不群」的自我期許，才能蔚為宋詩與宋調之獨闢蹊徑、自得自到。

宋代詩人無不學古，學古多以唐詩大家名家為宗尚，此有賴圖書傳播，尤其是印刷傳媒之化身千萬、無遠弗屆方能完成。又以「變唐」、「變古」、自成一家為目標，亦以唐詩為參照對象。宋人學古通變，於是詩風變異，而有陌生化之美感；詩思詩語追求自得，而具創發性之成就。所謂「詩分唐宋」，分野、鑑別當在此等。權衡一代文學之價值，裁量詩人詩作之造詣，筆者標榜：「應以新變自得為準據，不當以異同源流定優劣」，此一標準適用於唐詩及李白、杜甫，自然也適用於宋詩及蘇軾、黃庭堅。

日本內藤虎次郎（1866-1934）研究中國近代史，著有〈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提出「唐宋變革」說、「宋代近世說」，<sup>29</sup>論述唐宋在文化方面之顯著差異，包括政治、社會、經濟、科舉、文學（古文、詩餘）、繪畫之不同。內藤之說，頗富創見與發明，影響世界漢學極大。內藤強調唐宋的分野，其弟子宫崎市定專研宋史，進一步闡釋宋代所具備的「近世」特徵，學說殊途同歸，於是接受內藤史學「唐宋變革」之名，且發揚光大，作為京都學派之主要學說。<sup>30</sup>筆者考察京都學派學說，似未將雕版印刷之崛起繁榮，印本文化之形成激盪，圖書流通作為知識傳媒之效應，列為唐宋變革之基因、或作為宋代近世說之外緣。深受內藤、宮崎學說影響者，如陳寅恪稱：「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

<sup>29</sup> 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黃約瑟譯，劉俊文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sup>30</sup> 參考高明士：《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唐宋間歷史變革之時代性質的論戰〉（臺北：東昇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9月），頁104-111；柳立言：〈何謂「唐宋變革」？〉，《中華文史論叢》總第八十一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頁125-171。

世」；<sup>31</sup>傅樂成亦撰文，強調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之不同；<sup>32</sup>二家立說，亦未提及雕版印書。鄧廣銘討論宋代文化的高度發展，提及右文政策「指擴大科舉名額，以及大量刻印書籍」，<sup>33</sup>惜並未論證申說。日本清水茂撰有〈印刷術的普及與宋代的學問〉一文，<sup>34</sup>亦未引伸發揮詮釋唐宋變革，或詩分唐宋。筆者最近關注雕版印刷與宋代文學之互動，甚至宋代學術間之關聯，曾撰〈博觀約取與宋詩之學唐變唐——梅迪奇效應與宋刊唐詩選集〉文稿，<sup>35</sup>今再以唐人別集在宋代之雕印為論題，探討圖書傳播如何影響宋詩之新變，如何造就詩分唐宋，如何促成唐宋變革諸課題，期望能補苴罅漏，張皇斯學。還望博雅方家，不吝指教。

### 三、前代詩文集之整理雕印與宋詩典範之追求

華夏文明發展至宋代，堪稱登峰造極。就詩歌而言，六朝和四唐詩人之成就，已樹立許多風格典範；因此，如何學習古人之優長，作為自我創作之觸發或借鏡，成為宋代詩學之重要課題。以蘇軾黃庭堅為首之「學古論」，強調多讀書可以有益於作文：<sup>36</sup>蘇軾提示讀書法，在「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黃庭堅亦強調讀書貴在精博，所謂「詞意高勝，要從學問中來爾」。蘇、黃以此教人，頗影響江西詩派及其他宋人之創作與評論，所謂「以學問為詩」，所謂文人之詩者是；<sup>37</sup>

<sup>31</sup> 陳寅恪：《全明館叢稿二編》，〈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北京：三聯書店，19922001.7），頁 277。參考王水照〈陳寅恪的宋代觀〉，《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四期（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8 年 12 月），頁 1-15。

<sup>32</sup>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原載《國立編譯館館刊》一卷四期（1972 年 12 月）；後輯入《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7 年 9 月），頁 339-382。

<sup>33</sup> 《鄧廣銘治史叢稿》，〈宋代文化的高度發展與宋王朝的文化政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年 6 月），頁 66，頁 71。

<sup>34</sup> 《清水茂漢學論集》，蔡毅譯，〈印刷術的普及與宋代的學術〉（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10 月），頁 88-99。

<sup>35</sup> 張高評：〈博觀約取與宋詩之學唐變唐——梅迪奇效應與宋刊唐詩選集〉，宋代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四川大學古籍所承辦，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復旦大學古代文學研究中心主辦，2006 年 8 月 16-18 日，頁 1-26。

<sup>36</sup> 同註 24，《蘇軾文集》卷十，〈稼說送張琥〉，頁 340；《黃庭堅全集》第二冊《正集》卷十八，〈與王觀復書〉其一；第三冊《別集》卷十一，〈論作詩文〉其一（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 年 5 月），頁 470，頁 1684。參考黃景進：〈黃山谷的學古論〉，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主編《宋代文學與思想》（臺北：學生書局，1989 年 8 月），頁 259-283。

<sup>37</sup> 成復旺、黃保真、蔡鍾翔：《中國文學理論史》《二》，第四編第四章，第三節〈包恢與劉克莊〉，

《滄浪詩話·詩辨》雖稱「詩有別材，非關書也」；但又說：「然非多讀書，則不能極其至。」可見讀書學古之關連與重要。

宋人以學古通變為手段，期許「自成一家」為目的，尋求典範遂成為宋代詩人的當務之急。至於典範之選擇，則關係到文學之閱讀接受諸活動；文學閱讀接受又牽涉到認知功能、審美體驗、價值詮釋，和藝術創發問題。<sup>38</sup>宋人追尋典範，曾歷經漫長而曲折之旅程：白體、崑體、昌黎體、少陵體、靖節體、晚唐體、太白體，先後管領風騷，贏得許多宋詩大家名家之閱讀、學習與宗法。<sup>39</sup>

唐人詩文集，多經宋人輯佚、整理、校勘、雕印，始得流傳後世。<sup>40</sup>宋人整理刊刻唐人詩文集，目的在於「學唐」，而後「變唐」，其終極目標，在新變代雄，自成一家。從閱讀→接受→飽參→宗法→新變→自得，雕版印刷實居觸媒推助之功。試翻檢宋代文學發展史，當知宋詩特色形成之進程中，經歷學西崑體、學樂天體、學晚唐體、學昌黎體、學杜少陵、學陶靖節諸典範之追尋。因此，李商隱詩、白居易詩、韓愈詩，以及陶潛詩、杜甫詩之整理與刊行，亦風起雲湧，相依共榮；詩風文風之走向，與典籍整理，圖書版本刊行相互為用。試考察唐代詩人別集寫本刊本在宋代之傳播流傳，印合宋詩各期典範之追求，可見宋詩學古通變之一斑。

為體現宋代之文化活動實況，研究宋代之文學與學術，若能嘗試整合版本學、目錄學、文獻學而一之，研究視角既獨特，成果必定新穎可觀。此中天地，無限遼闊。綜觀詩歌創作之類型中，較受圖書閱讀、版本流傳諸因素影響者，莫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年7月)，頁473-476；顧易生、蔣凡、劉明今：《宋金元文學批評史》，第二編第四章第二節〈劉克莊〉，二、詩非小技呈「本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6月)，頁343-346。

<sup>38</sup> 金元浦：《接受反應文論》，第三章〈開拓者：從文學史悖論到審美經驗—姚斯的主要理論主張〉，第四節「走向文學解釋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頁136-147。

<sup>39</sup> 蔡啟：《蔡寬夫詩話》第四十三則，〈宋初詩風〉；嚴羽：《滄浪詩話·詩辨》；元方回《桐江續集》卷三十二〈送羅壽可詩序〉；清宋犛：《漫堂說詩》、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六〈宋詩紀事序〉。

<sup>40</sup> 周勛初：〈宋人發揚前代文化的功績〉：「唐詩由于宋人的及時整理而得以保存原貌，又由于宋人的及時刊出而得以流傳後世」，《國際宋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年10月)，頁67。陳伯海主編：《唐詩學史稿》，第二編第二章第一節〈作為文學遺產的唐詩文獻整理工作〉，第三章第一節〈「千家注杜」與唐詩文獻學的深化〉(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頁196-206，頁236-246。



如詠史詩與讀書詩，筆者曾發表相關論文若干篇，分別從古籍整理、圖書傳播、雕版印刷、版本目錄、閱讀接受諸角度切入考察，<sup>41</sup>以探討宋詩特色，以及詩分唐宋、唐宋詩異同諸課題，自信頗有發明。今再以宋人整理前代古籍，雕版印刷唐代詩文集為課題，續作探討。

### （一）唐人別集之整理雕印與宋詩之學唐變唐

唐詩「菁華極盛，體制大備」，難怪清代蔣士銓感慨：「宋人生唐後，開闢真難為」，對於唐詩大家名家樹立之典範，宋人究竟如何進行超脫，是否可能取代？清人吳之振序《宋詩鈔》稱：「宋人之詩變化於唐而出其所自得」；葉燮《原詩》推崇宋詩穿鑿刻抉之成就為：「變唐人之所已能，而發唐人之所未盡」；試考察宋初以來宗唐詩風之流變，樂天、義山、太白、杜甫詩之各領風騷，可以知之：

國初沿襲五代之餘，士大夫皆宗白樂天詩，故王黃州主盟一時。祥符天禧之間，楊文公、劉中山、錢思公專喜李義山，故崑體之作，翕然一變。……景祐慶曆後，天下知尚古文，於是李太白、韋蘇州諸人，始雜見於世。杜子美最為晚出，三十年來學詩者，非子美不道，雖武夫女子皆知尊異之。李太白而下，殆莫與抗。文章顯晦，固自有時哉！（蔡居厚《蔡寬夫詩話》，《宋詩話輯佚》本）

宋初詩風，先宗法白居易，其次李商隱、李白、韋應物，最終師法杜工部詩，所謂以「學古通變」為過程，而以「自成一家」為目標。綜合上述諸家之論，宋詩之特色與價值，在變唐發唐、取材廣博，命意生新，妙處自得。宋陳巖肖《庚溪詩話》云：「本朝詩人與唐世相抗，其所得各不同，而俱自有妙處，不必相蹈襲也。」嚴羽《滄浪詩話·詩辨》亦曰：「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至東坡山谷始自

<sup>41</sup> 張高評：〈北宋詠史詩與《史記》楚漢之爭——古籍整理與宋詩特色〉，《漢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2003年11月，頁419-441；〈印本文化與南宋陳普詠史組詩〉，台灣大學中文系主編《唐宋元明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大安書局，頁201-241，〈北宋讀書詩與宋代詩學——從傳播接受之視角切入〉，擬刊載於《韓學研究》第廿四卷第二期（2006年12月）。

出己意以為詩，唐人之風變矣。」明曹學佺序《宋詩》謂：「取材廣而命意新，不勦襲前人一字」；所謂同歸而殊途，百慮而一致者是也。筆者以為，宋詩營造之特色，所以能與唐詩分庭抗禮，蔚為錢鍾書《談藝錄》所謂「詩分唐宋」之文學事實，不僅是宋人學古通變之效應，更是新變與自得之共識與發用。

就學唐變唐而言，圖書流通、知識傳播，必然左右典範選擇之對象；同時，審美接受、典範選擇，亦反映在雕版印刷、或寫本鈔本之取捨上，兩者交互為用，於是促成宋詩學唐、變唐、發唐、自得、成家。其中印刷傳媒對於助長圖書流通，有無遠弗屆之效，影響獨大。唐人詩文集多經宋人整理雕印，始能流傳後世，沾溉古今。宋人之雕印唐人詩文集，大抵與典範學習有關。筆者以為：整理雕印之目的，為學唐變唐發唐，與期許自成一家。試觀宋初以來之典範追尋，分別為白體、晚唐體、昌黎體、太白體、劉賓客體；而宋詩之終極典範，則在靖節體與少陵體，詩品人品之獲致了解接受，實得力於印刷傳媒之流布與促成。今依序論述如下，以見印刷傳媒對宋詩特色促成之關聯：

### 1. 《白氏文集》之刊行與白體之發用

宋初，徐鉉、李昉、王禹偁等，詩學白居易（772-846）；蘇軾、張耒踵事增華，亦宗法樂天詩，號稱「白體」。梁昆《宋詩派別論》稱：「樂天詩派流行年代，自宋初建國至王禹偁（960-1001）卒」；<sup>42</sup>風氣既開，再經蘇軾、張耒之宗法，及宋詩話筆記之標榜與接受，於是白體與宋詩結下不解之緣。

在宋代，《白氏文集》有崇文院寫校本、北宋七十卷吳刊本、蜀刊本，傳七十一卷廬山本，及七十二卷景祐杭州刊本；南宋有蘇刊本、紹興刊本、蜀刊本等。<sup>43</sup>樂天詩學在宋代之接受反應，詩話、筆記、題跋、文集，所在多有。<sup>44</sup>徐復觀曾謂：「北宋詩人都有白詩的底子」；白樂天詩有如繪畫的粉本，「各家在此粉本

<sup>42</sup> 梁昆：《宋詩派別論》，〈香山派〉（臺北：東昇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5月），頁11。以下宋詩諸體流行年代，多參考此書，不贅。

<sup>43</sup> 萬曼：《唐集敘錄》，《白氏文集》敘錄（臺北：明文書局，1982年2月），頁239-244。謝思煒：《白居易集綜論》、《白氏文集》的傳布及「淆亂」問題辨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8月），頁3-31；日本岡村繁：《唐代文藝論》，第三篇第三章《白氏文集》的舊鈔本與舊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0月），頁130-154。

<sup>44</sup> 參考陳友琴：《白居易資料彙編》，宋代份量佔全書近二分之一（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月），頁29-182。

上，再加筆墨之功」，故嚴羽《滄浪詩話·詩體》有所謂「白樂天體」。「白體」對宋代詩人之影響，樂天詩學在宋代之接受，不只蘇軾一人而已，其他尚多，<sup>45</sup>頗值得探討。

白居易生前，曾手訂詩文集，謄鈔五部，一本置廬山東林寺藏經院，一本置蘇州禪林寺經藏內，一本在東都聖善寺鉢塔院律庫樓，一本付姪龜郎，一本付外孫閣童。其他日本、新羅及中土士人傳寫者，不在此數。然經五代之喪亂，至宋初，上述五大鈔寫本皆已亡佚，不知所終。處心積慮保存寫本如此，尚不免散佚之劫難，此與寫本之難成、易毀、價昂，不便度藏有關。由於宋代廣用雕版印刷圖書，大幅改善圖書複製技術，圖書信息交流快速，大眾傳播效率提高，促成知識革命。印刷傳媒有化身千萬，無遠弗屆，以及「易成、難毀、節費、便藏」諸優良，促成圖書流播之便捷，知識獲取之豐厚而精實，對促進宋人學古通變之成功，自有推助之功。

## 2. 李賀、姚合、賈島、李商隱詩集之雕印與晚唐體之流行

魏野、寇準、林逋、九僧作詩，學習晚唐李賀、姚合、賈島，號稱「晚唐體」。依梁昆《宋詩派別論》之見，晚唐詩派流行年代，似乎只在太平興國與天聖間（980-1026）。然學界論述指出：學習晚唐之詩風，幾乎籠罩南北宋。自歐陽脩、梅堯臣追求意新語工，舉例推崇之，其後歷經蘇軾、黃庭堅之解讀，南宋陸游、楊萬里、江西、四靈詩人之汲取化變，至嚴羽《滄浪詩話》評價晚唐詩，多可見晚唐詩風之沾溉與影響。<sup>46</sup>

反應在版本學上，於是宋刻本李賀（790-816）詩集有京師本、蜀本、會稽姚氏本、宣城本、鮑欽止家本五種，南宋蜀刻《李長吉文集》四卷，今尚存，《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收錄之。姚合（775-855?）詩集宋代有浙本、川本兩種。賈島（779-843）《長江集》，有宋刊本兩種，為明仿宋刻祖本。<sup>47</sup>楊億、劉筠、錢惟

<sup>45</sup> 徐復觀：《中國文學論集續篇》，〈宋詩特徵試論〉（臺北：學生書局，1984年9月），頁31。  
朱易安：《唐詩學史稿》，〈白居易與詩歌批評視野的嬗變〉，關於「白樂天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10月），頁100-104。

<sup>46</sup> 黃奕珍：〈宋代詩學中「晚唐」觀念的形成與演變〉，《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二期（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6年9月），頁225-237。

<sup>47</sup> 同註43，《唐集敘錄》，《李賀歌詩》敘錄，頁226-228；《姚少監集》敘錄，頁263-265；《長

演等西崑詩人宗法李商隱（813?-858），明刊本李詩，多出自北宋三卷刊本；《西清詩話》《延州筆記》曾載劉克、張文亮註解李義山詩。《蔡寬夫詩話》稱：王荊公晚年喜稱義山詩；《石林詩話》引述王荊公言，以為學詩當先學商隱而後老杜；朱弁《風月堂詩話》卷下謂黃庭堅詩學：「乃獨用崑體工夫，而造老杜渾成之地」；義山詩之含蓄工細、包蘊密緻，在宋代之接受或影響，可以考見。<sup>48</sup>當然，宋人學習晚唐詩「意新語工」之風氣，也體現在晚唐詩人文集之整理上。從文獻整理、寫本傳鈔、印本刊行到詩歌創作、詩學評論，構成宋人學唐變唐之網絡。

### 3. 五百家注韓與昌黎體之體現

韓愈（768-824）作為古文家與詩人，沾溉宋人極多，此與宋人學唐變唐、古籍整理，圖書流通關係密切：據《宋詩派別論》稱：北宋詩人學韓者有穆修、石延年、余靖、石介、梅堯臣、蘇舜欽、歐陽脩諸家，號稱「昌黎體」。

考昌黎詩派流行時期，在仁宗天聖、神宗熙寧間（1028-1072），開風啟習影響深遠：宋人對韓愈詩文集之整理，有所謂五百家註韓之說，學界全面稽考宋代之《韓愈文集》傳本，確認已經失傳之宋元韓集傳本大約 102 種；流傳至今之宋元韓集傳本尚存 13 種。<sup>49</sup>宋代整理韓集之功臣，較著者有歐陽脩之校勘，以及朱熹之《韓文考異》。就詩文集之出版而言，《昌黎先生文集》在北宋，以祥符杭本最早。同時有蜀中刻本，有穆修刊印唐本《韓柳集》。其後又有饒本、閣本、謝克家本、李昺本、洪興祖本、潮本、泉本諸本。由於文壇有心提倡，因此傳世之《昌黎先生文集》宋刻本有十種之多，臺北故宮博物院更有浙刻巾箱本。<sup>50</sup>

---

江集》敘錄，頁 305-307。

<sup>48</sup> 同註 43，《唐集敘錄》，《李義山集》敘錄，頁 283-285。參考吳調公：《李商隱研究》，第八章，一、〈從西崑體的因襲李詩之短，到王安石、黃庭堅善於吸收李詩的營養〉（臺北：明文書局，1988 年 9 月），頁 220-232；劉學鐸等：《李商隱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11 月），頁 11-114。

<sup>49</sup> 參考劉真倫：《韓愈集宋元傳本研究》，第一編〈集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 6 月），頁 35-338。又，劉真倫：《韓愈〈昌黎先生集〉編次考》，《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八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1 月），頁 171-187。

<sup>50</sup> 同註 43，《唐集敘錄》，《昌黎先生文集》敘錄，頁 167-169；陳伯海、朱易安：《唐詩書錄》，〈韓愈〉（濟南：齊魯書社，1988 年 12 月），頁 337-338。劉琳、沈治宏：《現存宋人著述總錄·集部別集類》，羅列：《韓集舉證》等宋人對韓愈文集整理之刻本九種（成都：巴蜀書社，1995 年 8 月），頁 224-225。

川地區刊刻，見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有《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為蜀刻十二行二十一字本；又有《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三卷，為蜀刻十行十八字本。杭州地區所刊，有咸淳間廖瑩中世綵堂刻本《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為九行十七字本，今藏北京國家圖書館。福建地區所刊，為南宋建安魏仲舉所刻《新刊五百家注音辯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天祿琳琅》載有兩部；要皆刊刻於慶元六年（1200），十行十八字本。<sup>51</sup>其他藏本、寫本，亦相對眾多，足見當時流傳之盛。

清沈曾植稱：「宋詩導源於韓」；又云：「歐蘇悟入從韓，證出者不在韓，亦不背韓也，如是而後有宋詩」；<sup>52</sup>韓詩之「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以奇崛為詩、以雕縷為詩、以義法為詩、對宋人尤其是歐陽脩、梅聖俞、王安石、王令、蘇軾、黃庭堅，以及江西詩人多有影響。試再考察宋代之詩話、筆記、題跋、文集於韓詩韓文之解讀、詮釋極夥，從中可見宋代之韓學接受與影響。論者稱，宋人對韓文的評論，與宋學自身的建設密不可分：宋人對韓愈思想之接受，促成宋學之發生；宋人對韓學之懷疑與批判，促成宋學之深化與成熟。宋代詩話 70 餘種，宋人筆記 100 餘種，雜說 100 餘種，於韓詩、韓文、韓學多所討論與發明。<sup>53</sup>筆者以為，宋人尊韓學韓，論韓闡韓，蔚為五百家注韓之大觀，《韓集》之刊行傳鈔，自是其中之觸媒與功臣。

#### 4. 《劉夢得文集》之刊刻傳播與宋調宗法

劉禹錫（772-842）品格端正，詩品一如其人。其詩作學習民歌，變革詩體，怨刺托諷，寓犀利於婉曲；法度嚴明，技藝精湛，用字講究來歷，論詩標榜斤斫無迹。宋代詩人如王安石、蘇軾、蘇轍、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楊萬里、范

<sup>51</sup> 潘美月：〈宋刻唐人文集之流傳及其價值〉，國家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印，《屈萬里先生百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6年12月，頁177-204。

<sup>52</sup> 黃濬：《花隨人聖盦摭憶》，〈沈子培以詩喻禪〉（上海：上海書店，1998年8月），頁364。

<sup>53</sup> 吳文治：《韓愈資料彙編》（臺北：學海出版社），頁71-598。夏敬觀：《唐詩說》，〈說韓愈〉（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12月），頁75-79；參考同註49，第三編〈詩文評〉，上編「詩話」、中編「筆記」、下編「雜說」，頁396-552。

成大諸家，宋詩特色之建構與傳承者，多受其沾溉與影響。<sup>54</sup>

劉禹錫詩，先後得上述宋詩大家名家之喜愛推崇，學習師法，對於宋詩特色之形成，有推助作用。劉氏文集，自編為四十卷，其後刪為《集略》十卷，至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六著錄蜀刻本《劉夢得文集》三十卷，云：「集本四十卷，逸其十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劉禹錫夢得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崇文總目》著錄《劉賓客集外詩》三卷。元明以來，宋槧若存若亡，清黃丕烈得一宋刊殘本，另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六十九著錄，係述古堂影宋本；《天祿琳琅》四著錄，係琴川毛氏影宋抄本。《劉夢得文集》宋刊之全者，留存在日本，為平安福井氏崇蘭館藏書，今歸天理圖書館珍藏，共十二冊，四十卷，前三十卷題為《劉夢得文集》，書名同北京圖書館所藏宋刊本，後十卷題為《劉夢得外集》，與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宋刊本《劉賓客文集》，及傳世之通行本無異。宋刊劉集之存於今者，北京圖書館僅存四卷，天理圖書館、臺北故宮圖書館四十卷，內外集皆全。<sup>55</sup>宋代印刷傳媒之刊行詩集，自是詩壇、文苑、士林師法唐詩優長之反應回路，猶形之於影、音之於響然。

## 5. 《李太白文集》之刊印與李杜優劣論

王禹偁（954-1001）、歐陽脩（1007-1072）、蘇軾（1037-1101）、黃庭堅（1045-1105）、徐積（1028-1103）、郭祥正（1035-1113）、李之儀（1048-1117）、孔平仲（哲宗徽宗朝在世）諸家作詩，則兼學李太白（701-762），楊萬里《誠齋詩話》稱為「李太白詩體」，《滄浪詩話》稱為「太白體」。可見宋人接受李白詩蔚為流行時期，在太宗太平興國年間至徽宗崇寧大觀間，前後一百餘年。反映於古籍整理，版本流傳，亦可得而言：

傳世之《李太白文集》，多由宋人重輯、校勘、與增訂而來，其中樂史於咸平元年（998）編纂《李翰林集》20卷、熙寧元年（1068）宋敏求重編增訂為三

<sup>54</sup> 蕭瑞峰：《劉禹錫詩論》，第九章第二節〈影響久遠的一代詩豪〉（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9月），頁257-264。

<sup>55</sup> 同註43，《劉賓客集》敘錄，頁201-204；嚴紹盪：《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第十章第四節，二、日本國寶宋刊本《劉夢得文集》與《歐陽文忠公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頁329-330；劉衛林：〈日本天理圖書館所藏所刊《劉夢得文集》流傳概略〉，宋代文化國際研討會，成都：四川大學，2006年8月。

十卷、曾鞏編年考次宋敏求本為《李太白文集》30卷，居功甚偉。元豐三年(1080)，蘇州太守晏處善〈知止〉將宋敏求、曾鞏所整理交付刊印，世稱蘇本，是為李白集第一個刻本。其他鏤版傳世者尚有蜀刻多本，當塗本，南宋咸淳己巳本，以及竄亂之坊本；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有《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正是北宋蜀刻本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皆提及元豐間晏處善蜀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清陸心源《儀顧堂集》〈北宋李太白文集跋〉以為此一蜀本「完善如新，可寶也。」《中國版刻圖錄》云：「此為李集傳世最古刻本」。<sup>56</sup>由於宋型文化與唐型文化不同，引發「李杜優劣論」在宋代之爭論：王安石《四家詩選》、釋惠洪《冷齋夜話》、胡仔《苕溪漁隱叢話》、陳善《捫蝨新話》，多主李不如杜；蘇轍《詩病五事》、李綱〈讀四家記〉、羅大經《鶴林玉露》諸書，更非議太白之思想與人格。<sup>57</sup>探討此一專題，除從唐宋審美之流變、期待視野之不同，影響典範選擇之殊異外，又可以考量從古籍整理、圖書出版流通觀點解讀，不妨據此考察嘗試。

## (二) 陶集、杜詩之整理刊行與宋詩典範之選擇

唐宋審美情趣各有宗尚，筆者以為，此乃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之發用，如響斯應，如影隨形。宋人姚寬《西溪叢語》已先發其蒙，清俞樾《茶香室叢鈔》，亦略道其然，惜皆未敘說所以然之故。其中曖而不明，鬱而不發處，正是問題關鍵處，姚寬云：

殷璠為《河嶽英靈集》，不載杜甫詩；高仲武為《中興間氣集》，不取李白詩；顧陶為《唐詩類選》，如元、白、劉、柳、杜牧、李賀、張祜、趙嘏，

<sup>56</sup> 同註 43，《唐集敘錄》，《李翰林集》敘錄，頁 79-83。宋人整理李白詩文集，傳世者有北宋蜀刻本，日本靜嘉堂文庫、北京圖書館所藏，即是此一刊本，十一行，行二十字。又有南宋咸淳刊本《李翰林集》30卷，楊齊賢：《分類補注李太白詩》25卷，詳參平岡武夫編：《李白的作品》，〈靜嘉堂本《李太白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1月），頁 1-11；郁賢皓主編：《李白大辭典·版本》（桂林：廣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1月），頁 318-319。

<sup>57</sup> 馬積高：〈李杜優劣論和李杜詩歌的歷史命運〉，李白研究學會編《李白研究論叢》第二輯（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12月），頁 289-300；蔡瑜：《宋代唐詩學》，第四章第二節，三、〈李白杜甫優劣說〉（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9年6月），頁 272-285。

皆不收；姚合作《極玄集》，亦不收杜甫、李白。彼必各有意也。（宋姚寬《西溪叢語》卷上）

《河嶽英靈集》何以不載杜詩？《極玄集》何以并李杜詩皆不收？姚寬只模糊臆測：「彼必各有意也」；究竟取捨予奪之間，有何「意」趣，並未明說。俞樾《茶香室叢鈔》卷八〈唐人選唐詩〉條亦引述姚寬之言，略加闡釋云：「余謂李、杜諸人，在今日則光芒萬丈矣；在當日亦東家丘耳；或遭擯棄，初不足怪。」亦只就清初以來李杜「光芒萬丈」之事實陳說而已，在唐代何以「或遭擯棄」，「亦東家丘耳」？俞樾並未論辨推因。筆者考察宋代之古籍整理，以類推詩學風尚；<sup>58</sup>研究宋代讀書詩、宋人選唐詩，以鉤稽詩學典範，<sup>59</sup>其中牽涉到李杜優劣論、宋人之期待視野、唐宋之審美流變、以及宋人之學古通變諸問題，已嘗試作若干詮釋。今再就詩集之整理刊行，推測印刷傳媒可能引發之接受與反應，據以解讀陶集杜詩蔚為宋詩典範之所以然。

學古通變，是宋人傳承文學遺產，兼顧開拓發揚，達到自成一家之必經歷程。宋初以來，此消彼長之典範選擇，「從歐陽脩之推韓、李，到王安石、蘇軾、黃庭堅之倡陶杜，反映了審美意識從『發揚感動』到『覃思精深』；從『不平則鳴』、『窮而後工』到『悠然自得』、『無意為詩』的變化」；論者稱：陶淵明與杜甫詩學典範之形成，是以互補的形式集中體現了宋代詩人基本創作意識和審美理想，如「少陵有句皆憂國，陶令無詩不說歸」；「少陵雅健材孤出，彭澤清閒興最長」；「拾遺句中有眼，彭澤意在無弦」之類，<sup>60</sup>可作代表。筆者以為：陶詩與杜詩，蔚為宋代詩學典範，學習之、宗法之，此非有圖書之閱讀、接受、參照與轉化不為功。藏本、抄本、寫本無論矣，印刷傳媒之化身千萬，無遠弗屆，將更有助於陶、杜典範之形成。

## 1. 《陶淵明集》之整理刊刻與宋詩之典範

<sup>58</sup> 張高評：《自成一家與宋詩宗風》，〈杜集刊行與宋詩宗風——兼論印本文化與宋詩特色〉（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4年11月），頁1-65。

<sup>59</sup> 同註23、註35。

<sup>60</sup> 程杰：〈從陶杜詩的典範意義看宋詩的審美意識〉，《文學評論》1990年2期。



陶淵明（365-427）之人格風格，與杜甫先後輝映，蔚為宋人詩學之兩大典範，號稱「陶杜」。宋代詩人如徐鉉、林逋、梅堯臣、宋庠、王安石、蘇軾、蘇轍、黃庭堅、秦觀、陳師道、陸游、楊萬里、朱熹諸家，要皆為尊陶、學陶、和陶、宗陶之代表；其中蘇軾所作和陶詩 124 首，尤稱經典大宗。<sup>61</sup>至於評詩論人，稱許贊揚陶詩、陶公者，如蘇軾、王安石、黃庭堅、陳師道、晁補之、張戒、真德秀、汪藻、許彥周、劉克莊、何汶、嚴羽、陸游、辛棄疾、朱熹諸家，多稱揚人品之高潔，強調作品之價值，凸顯學陶之意義。<sup>62</sup>由此觀之，兩宋詩人對陶淵明詩之接受與反應，既普遍又持久，當是審美接受之「期待視野」相貼近之故。陶淵明之道德文章，備受宋人推崇，堪作師表。於是有關《陶淵明集》之藏本、寫本、印本亦因供需相求而版本多元，圖書傳播與典範選擇間，自有依存消長之關係。

古籍整理《陶淵明集》方面，據郭紹虞考證，北宋本已有七種，今只存其一；南宋本有九種，今亡佚其四。北宋開始對《陶淵明集》進行校訂翻刻，宋庠（996-1066）重刊十卷本《陶潛集》，僧思悅於治平三年（1066）將《陶集》重加整理付梓，其後洪邁、嚴羽、湯漢等人對作品亦多所考訂辨析。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稱：靖節先生集有七卷、十卷、九卷、五卷數本，可謂卷次互異，版本紛呈，甚至出現攜帶方便之「巾箱車」《陶集》，終宋之世，陶集版本大約在 17 種以上。<sup>63</sup>至於宋人對陶詩典範之追尋與接受，宋代詩話、筆記、題跋等詩學亦多有體現。印刷史、版本學、文獻學之整合研究，宋代陶詩學值得考察檢視。宋人之學古通變，大抵以唐詩為宗法對象，唯一例外，為師法陶淵明，故附記於末。

<sup>61</sup> 《朱靖華古典文學史論集》，〈論蘇軾的〈和陶詩〉及其評價問題〉（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年 10 月），頁 133-151。

<sup>62</sup> 參考北京大學、北京師大中文系合編：《陶淵明研究資料彙編》（《陶淵明卷》）（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參考鍾優民：《陶學史話》，第三章〈高山仰止，推崇備至〉（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1 年 5 月），頁 64-73。

<sup>63</sup>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書後羅列「主要參考書目」，關於兩宋刻本者傳世而參考者有六種，如宋刻遞修本《陶淵明集》十卷本，有兩種；黃州刻本《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四卷；紹興刻本，蘇體大字，《陶淵明集》十卷；紹熙三年曾集刻本，《陶淵明詩》一卷，《雜文》一卷；湯漢注，淳祐元年湯漢序刻本《陶靖節先生詩注》四卷，《補注》一卷。雕版印刷傳存於今者，尚有如此之多，可以想見印刷傳媒對當時陶詩之傳播與接受之影響。（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4 月），頁 871。

## 2. 千家注杜、杜集編印，與宋詩宗杜風尚

杜甫（712-770）之人格與風格，與宋人之生命情調諸多契合，故自王禹偁推尊杜詩成就，以為「子美集開詩世界」，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陸游、文天祥、元好問、方回諸大家，及江西詩派諸子，要皆先後宗主杜甫，推尊為詩學之典範，楊萬里《誠齋詩話》號稱「杜子美詩體」，而嚴羽《滄浪詩話·詩體》稱為「少陵體」。<sup>64</sup>由此觀之，杜甫詩在宋代流行時期，頗為漫長與持久，大抵從北宋太平興國年間，歷經南北宋之交，一直到南宋咸淳景炎、及蒙元大德年間（976-1307），前後 300 餘年。由於杜甫之憂患、悲憫、耿直、忠愛，在歷經喪亂、宋金對峙之南宋，詩人感同深受，於是與主流詩人之期待視野不謀而合；杜詩之風格多樣、體兼眾妙與宋型文化之「會通化成」合轍，故蔚為宋詩之最高典範。

就周采泉《杜集書錄》所云：宋代杜集之整理、刊刻、傳鈔，堪稱盛況空前：計有全集校刊箋注類 36 種、存目 15 種；輯評考訂類 14 種、譜錄類 12 種、選本鈔寫類 13 種、選本輯佚類存目 5 種、集句類 7 種、石刻類 3 種、雜著類 3 種、偽書類 12 種、存疑類 12 種；以上杜集版本 129 種，總量 1240 卷以上。南宋理宗寶慶二年（1226）董居誼為黃氏父子《千家註杜》作序時稱：「近世鋟板，注以集名者，毋慮二百家」，可見其流傳之盛況，舉世之風靡。杜集之傳鈔與刊刻，已橫跨南北兩宋矣；再就杜集刊刻之分佈而言，亦無所不在：有蘇州刻本、洪州刻本、成都刻本、福唐刻本、建康刻本、建安刻本、興國刻本、浙江刻本等等；其中又分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除外，尚有若干藏本、寫本，不計在內。於是閱讀、學習、宗法、評論杜詩蔚為風潮，歷經南北兩宋。自始至終，皆與《杜甫詩集》之整理與刊行相輔相成，自是不爭的事實。<sup>65</sup>

宋詩典範之選擇，歷經漫長之旅程，宋初，士大夫多宗白樂天詩，祥符天禧間，楊億、劉筠專喜李義山；景祐慶曆後，李太白、韋應物諸人，始雜見於世。其後蘇軾、黃庭堅學杜詩、尊杜甫，蘇軾更推崇陶淵明，江西門徒甚眾，陶詩杜

<sup>64</sup> 曾棗莊：〈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論宋人對杜詩的態度〉，輯入《唐宋文學研究》（成都：巴蜀書社，1999年10月），頁35-49。

<sup>65</sup> 參考周采泉：《杜集書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

詩遂蔚為宋詩之詩學典範。<sup>66</sup>袁枚所謂「唐人學漢魏，變漢魏；宋學唐，變唐。使不變，不足以為唐，亦不足以為宋也」；確定宋人學唐、變唐，而能自成一家，猶唐人學漢魏、變漢魏，形成唐詩唐音之本色然。清吳之振《宋詩鈔·序》稱：「宋人之詩變化於唐，而出其所自得」；學唐變唐，又出其所自得，此非有圖書雕版、印行傳播不為功。宋代印本寫本並行，知識流通乃日新月異，「詩分唐宋」，各造輝煌，始成為可能。

#### 四、結論

雕版印刷，在宋代達到空前之繁榮，由於印本有「易成、難毀、節費、便藏」之優勢，以及化身千萬，無遠弗屆之傳媒效應，因此，圖書流通快速，知識傳播產生革命性之改變。終宋之世，刊刻圖書之數量，當在數萬部以上。<sup>67</sup>加上寫本、鈔本、藏本圖書，作為傳統閱讀書卷，與印本圖書並行爭妍，蔚為趙宋文明之輝煌。有這麼多豐富的圖書資料，造成閱讀和運用上極大之便利，處於知識爆炸之宋代，影響所及，自然容易造成「資書以為詩」，王夫之《薑齋詩話》所謂「總在圈續中求活計」者是。於是在創作方面產生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所謂文人之詩者是；在詩學理論方面，標榜讀書博學，儲備詩材，強調「字字求出處」，主張學古變古，點鐵成金、以故為新、奪胎換骨，期許「出入眾作，自成一家」；朱熹論學所謂「舊學商量，新知培養」，其中自有圖書傳播與熟讀飽參之效應，尤其是印刷傳媒之作用在。

嚴羽身處印本書與寫本書爭輝之時，身居雕版印刷重鎮之福建邵武，又目睹江西末流之弊病，赫然發現宋詩之缺失：在試圖以「詩外」之物（書冊、學問）為詩，「役心向彼掇索」，忽略「直尋」，追求「補假」，這就是嚴羽所謂近代諸公的「奇特解會」。為矯正時弊，所以《滄浪詩話·詩辨》提出：「詩有別材，非關書也」；下半段更作一轉語說：「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終則標榜「自出己意以為詩」，作為變唐入宋之關鍵。其實，嚴羽明言「詩有別材，非

<sup>66</sup> 同註 42，《宋詩派別論》，〈分派法之商榷〉，頁 1-5。

<sup>67</sup> 同註 2，《中國圖書論集》，李致忠：〈宋代刻書述略〉，頁 204-221；楊渭生：《兩宋文化史研究》，第十一章〈宋代的刻書與藏書〉（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 467-487。

關書也，……而古人未嘗不讀書」，說得本極清楚明白。自清代詩話易「書」為「學」，異議遂多。<sup>68</sup>

詩人作詩，牽涉到兩方面，一是別材問題，一是如何讀書和如何用書問題。尤其是後者，以宋代圖書文獻流通便利而言，詩人作詩所應講究者，乃「書為詩用，不為詩累」，以消納書卷為上，賣弄學問為下。在印本文化取代寫本，圖書流通迅速，知識獲得便利之情勢下，資書以為詩，以才學為詩，以流為源，注重補假；捨本逐末，而「不恤己情之所自發」，宋人這種「奇特解會」，的確是創前所未有，開後無窮。以書卷、學問為觸發，學以致用，表現於詩作，在寫本文化之後，印本文化繁榮與當令之時，唐宋詩相比較，不失為獨到與創發。其中成敗優劣，與詩人之才能、悟性、素養關係最為密切；易言之，是個別詩人學以致用、消納轉化、圓融渾成諸問題，畢竟，「法在人」啊！試觀清代浙東詩派、桐城詩派、同光詩派論詩作詩，可悟其中道理。

黃宗羲《明儒學案·自序》稱：「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然讀書多，當為詩用，不作詩累，庶幾開卷有益。否則，豐富圖書只供詩人擗擗獮祭、蹈襲剽掠，不能去陳、化變、出新、入妙，是亦枉然。雕版印書、右文政策之施行，閱讀態度、創作風格亦隨之改觀。宋代士人面對「宋人生唐後，開闢真難為」之困境，大家名家紛紛發言，分別留心於詩思、命意、語言、學養之講究；王安石標榜杜甫「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蘇軾揭槩「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黃庭堅取譬「長袖善舞，多錢善買」；朱熹強調「舊學商量，新知培養」，可謂百慮一致，殊途同歸。其中東坡所云，最具代表性：博觀，指閱讀對象之廣博多元；厚積，指學問涵養之積累豐厚。博觀泛覽，而能別識心裁，是謂「約取」；學養豐厚，而作慎微之發用，是謂「薄發」，可見積學儲寶，讀書有益於作文。尤其針對唐詩所建構之敘述視角、描述過程、時空關係、語言形式，亦經由多讀書而博觀約取，而厚積薄發，而轉化新變。讀書博學，開卷有益，在在提示文學生存發展之道，如梅堯臣、歐陽脩、王安石、蘇軾、黃庭堅諸代表詩人所提示「會通化成」之道，以及「意新語工」之方，所謂獨創、自得，要皆以求異思維、創意造語為依歸。

<sup>68</sup> 參考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詩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2月），頁33-37。

宋人面對唐詩之輝煌璀璨，大抵採行兩大因應策略：以學唐為手段，而以變唐為目的。學唐，即是模仿、繼承、接受、汲取唐詩之優良傳統；變唐，卻是自覺的刻意轉化、修正、調整唐詩建構之典範與本色，從事更新、重寫、發揮、創造，而以形成宋詩特色之風格為極致。大抵宋代詩人多有布魯姆（Harold Bloom，1930-）所謂之「影響的焦慮」（The Anxiety of Influence），既接受唐詩，又挑戰唐詩；既受其影響，又思脫穎而出，進而取得獨立性、創造性。所謂「渴求中斷前驅詩人永無止境的影響，以代替前驅詩人而彰名於世」，宋詩之學古通變，期許自成一家近似之。宋人致力學古通變，期許自成一家，其終極成就果然疏遠了唐詩之本色，逆轉了唐人建構之詩歌語言，蔚為「詩分唐宋」之局面，所謂「唐音」與「宋調」者是。宋詩所以能逆轉唐詩影響，取而代之，而別子為宗，平分詩國之秋色者，趙宋王朝「擴大科舉名額，以及大量刻印書籍等」所謂「右文政策」，是其中之推手與助力。

唐人詩文集，多經宋人輯佚、整理、校勘、雕印，始得流傳後世。宋人整理刊刻唐人詩文集，目的在於「學唐」，而後「變唐」，其終極目標，在新變代雄，自成一家。從閱讀、接受、飽參，到宗法、新變、自得，雕版印刷實居觸媒推助之功。試翻檢宋代文學發展史，當知宋詩特色形成之進程中，經歷學西崑體、學樂天體、學晚唐體、學昌黎體、學杜少陵、學陶靖節諸典範之追尋。因此，李商隱、白居易、李賀、賈島、姚合、韓愈詩，以及陶潛、杜甫詩之整理與刊行，亦風起雲湧，相依共榮。詩風文風之走向，與典籍整理，圖書版本刊行相互為用。為體現宋代之文化活動實況，研究宋代之詩歌與詩學，本文嘗試整合版本學、目錄學、文獻學而一之，以考察唐代詩人別集之寫本、刊本在宋代之傳播流傳，印合宋詩各期典範之追求，自見宋詩學古通變之一斑。

南宋以來，宗唐詩話筆記對宋詩大加撻伐者，為與唐詩、唐音趣味不同之「非詩」特色。這些特色，不僅積極突破唐詩之「典範」；更刻意乖離唐詩之本色，創造性地破壞了唐詩之主體性，如以文為詩、詩中有畫、以詞為詩、以賦為詩、以史入詩、以禪喻詩、以禪為詩、以諱為詩、以書法入詩、以史筆為詩、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以及以翻案為詩、以活法為詩等等。宋人追求這種「非詩」之詩思、詩材、詩語、詩藝，於是體現「皮毛剝落盡」的陌生化，「出人意表」的新鮮感，「著意與人遠」的奇異性，以及「挺拔不群」的自我期

許，因此能蔚為宋詩與宋調之獨闢蹊徑，自得其到。這種獨到與創發性，跟創造思維（creative thinking）注重反常、辯證、開放、獨創、能動性，可以相互發明。而宋詩之所以呈現異趣殊味之「非詩」系列特色，在在跟印刷傳媒崛起，印本與寫本爭輝，甚至取代寫本有關。蓋圖書流通便捷，知識信息量暴增，提供學科整合會通之有利平臺，破體為文、出位之思之體現；學古通變、會通化成之發展，乃勢所必至，水道渠成。

綜要言之，宋人面對「菁華極盛，體制大備」之唐詩典範，因應之道，在以學唐為手段，以通變為策略，盡心於「破體」，致力於「出位」，從事「會通化成」，講究「意新語工」，追求自得其到，期許自成一家。凡此，多與讀書萬卷，學問精博相互為用。宋人整理雕印杜甫、李白、韓愈、白居易、劉禹錫、李商隱、李賀、賈島、姚合等唐代諸家詩文集，以及陶淵明集，作為典範之觀摩、學唐變唐之觸媒，加上寫本藏本之流通，圖書信息之豐富多元，於是宋人從閱讀、接受、飽參，進而宗法、新變、自得，將傳承優良與開拓本色畢成功於一役。雕版印刷之崛起，圖書流通之便捷，對於宋詩特色之生成，自有推波助瀾之效應。推而廣之，對於南宋以來張戒、嚴羽所斥「奇特解會」，明清宗唐詩話所譏「非詩」習氣，以及一切「唐宋詩之爭」課題；錢鍾書所提「詩分唐宋」說，乃至於日本內藤湖南所倡「唐宋變革」說，陳寅恪、傅樂成所謂宋型文化、文化造極云云，多可從宋代之印刷傳媒切入，作為詮釋解讀之試金石。

## 引用文獻

### 一、古籍原典

- 《蘇軾文集》，蘇軾著，孔凡禮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黃庭堅全集》，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本，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
- 《苕溪漁隱叢話》，胡仔著，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年。
- 《蔡寬夫詩話》，蔡啟著，郭紹虞《宋詩話輯佚》本，臺北：文泉閣出版社，1972年。
- 《陳輔之詩話》，《宋詩話輯佚》本，臺北：文泉閣出版社，1972年。
- 《增廣箋註簡齋詩集》，劉辰翁著，《四部叢刊》影宋本，白敦仁《陳與義校箋》附錄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 《滄浪詩話》，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 《漫堂說詩》，宋犖著，丁福保《清詩話》本，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年。
- 《鮚埼亭集》，清全祖望著，朱鑄禹《全祖望集彙校集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石洲詩話》，翁方綱著，《清詩話續編》本，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
- 《全宋詩》(1-72)，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1998年。

### 二、近人專著

- 《中國古書版本研究》，張舜徽著，臺北：民主出版社，無出版年月。
- 《陶淵明研究資料彙編》(《陶淵明卷》)，北京大學、北京師大中文系合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 《唐詩說》，夏敬觀著，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12月。
- 《宋詩派別論》，梁昆著，臺北：東昇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5月。
- 《唐集敘錄》，萬曼著，臺北：明文書局，1982年2月。
- 《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高明士著，臺北：東昇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9月。
- 《韓愈資料彙編》，吳文治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中國目錄學史》，王重民著，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 《中國文學論集續篇》，徐復觀著，臺北：學生書局，1984年9月。
- 《白居易資料彙編》，陳友琴著，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月。
- 《杜集書錄》，周采泉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
- 《中國文學理論史》，成復旺、黃保真、蔡鍾翔，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年7月。
- 《李商隱研究》，吳調公著，臺北：明文書局，1988年9月。
- 《談藝錄》，錢鍾書著，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88年11月。
- 《唐詩書錄》，陳伯海、朱易安著，濟南：齊魯書社，1988年12月。
- 《影響的焦慮》，哈羅德·布魯姆著，徐文博譯，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
- 《宋代唐詩學》，蔡瑜著，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9年6月。
- 《李白的作品》，平岡武夫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1月。
- 《漢字的魔方》，葛兆光著，香港：中華書局，1989年12月。
- 《陶學史話》，鍾優民著，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1年5月。
- 《北宋文化史述論》，陳植鏗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3月。
- 《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嚴紹璁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
- 《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鄧廣銘著，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
- 《中國印刷術的起源》，曹之著，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3月。
- 《李白大辭典》，郁賢皓主編，桂林：廣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1月。
- 《現存宋人著述總錄·集部別集類》，劉琳、沈治宏著，成都：巴蜀書社，1995年8月。
- 《劉禹錫詩論》，蕭瑞峰著，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9月。
- 《宋詩之新變與代雄》，張高評著，臺北：洪葉文化公司，1995年9月。
- 《思維辭典》，田運主編，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
- 《宋金元文學批評史》，顧易生、蔣凡、劉明今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6月。
- 《白居易集綜論》、《白氏文集》，謝思煒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8月。



- 《花隨人聖龕撫憶》，黃濬著，上海：上海書店，1998年8月。
- 《接受反應文論》，金元浦著，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
- 《兩宋文化史研究》，楊渭生著，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
- 《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宿白著，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3月。
- 《會通化成與宋代詩學》，張高評著，臺南：成功大學出版組，2000年8月。
- 《唐詩學史稿》，朱易安著，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10月。
- 《金明館叢稿》二編，陳寅恪著，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7月。
- 《李商隱資料彙編》，劉學鍇等著，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11月。
- 《唐代文藝論》，日本岡村繁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0月。
- 《陶淵明集箋注》，袁行霈著，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4月。
- 《宋代儒學與現代東亞文明》，石訓、楊翰卿等，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
- 《朱靖華古典文學史論集》，朱靖華著，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10月。
- 《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錢存訓著，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
- 《唐詩學史稿》，陳伯海主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
- 《韓愈集宋元傳本研究》，劉真倫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6月。
- 《內藤湖南研究》，錢婉約著，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7月。
- 《自成一家與宋詩宗風》，張高評著，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4年11月。
- 《書籍的歷史》，(法) 弗雷德里克·巴比耶著，劉陽等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1月。
- 《韓愈《昌黎先生集》編次考》，劉真倫著，《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八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1月。
- 《傳播學關鍵術語釋讀》，黃曉鐘、楊效宏、馮鋼主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年8月。
- 《梅迪奇效應》，Frans Johansson 著，劉真如譯，臺北：商周出版社，2005年10月。

### 三、期刊論文

- 〈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傅樂成撰，原載《國立編譯館館刊》一卷四期（1972

- 年 12 月); 後輯入《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7 年 9 月。
- 〈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內藤湖南撰，黃約瑟譯，劉俊文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 〈論宋代科舉取士之多與冗官問題〉，張希清撰，《北京大學學報》1987 年第 5 期。
- 〈黃山谷的學古論〉，黃景進撰，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主編《宋代文學與思想》，臺北：學生書局，1989 年 8 月。
- 〈從陶杜詩的典範意義看宋詩的審美意識〉，程杰撰，《文學評論》1990 年 2 期
- 〈李杜優劣論和李杜詩歌的歷史命運〉，馬積高撰，李白研究學會編《李白研究論叢》第二輯，成都：巴蜀書社，1990 年 12 月。
- 〈宋人發揚前代文化的功績〉，周勛初撰，《國際宋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 年 10 月。
- 〈中國歷代書價考〉，袁逸撰，《編輯之友》1993 年 2 期。
- 〈北宋貢舉登科人數考〉，張希清撰，《國學研究》第二卷，1994 年 7 月。
- 〈介紹有關書史研究之新發現與新觀點〉，查啟森撰，程煥文編《中國圖書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 年 8 月。
- 〈宋代詩學中「晚唐」觀念的形成與演變〉，黃奕珍撰，《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二期，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6 年 9 月。
- 〈陳寅恪的宋代觀〉，王水照撰，《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四期，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8 年 12 月。
- 〈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論宋人對杜詩的態度〉，曾棗莊撰，輯入《唐宋文學研究》，成都：巴蜀書社，1999 年 10 月。
- 〈清初宗唐詩話與唐宋詩之爭——以「宋詩得失論」為考察重點〉，張高評撰，《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學刊》第 1 期，臺北：學生書局，2002 年 6 月。
- 〈北宋詠史詩與《史記》楚漢之爭——古籍整理與宋詩特色〉，張高評撰，《漢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2003 年 11 月。
- 〈清初宋詩學與唐宋詩學之異同〉，張高評撰，第三屆國際暨第八屆《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高雄：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中心，2004 年 7 月。

- 〈論蔡倫發明「蔡侯紙」〉，劉光裕撰，《出版發行研究》2000年1、2期；《中國出版史料》第一卷轉載，宋原放主編，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0月。
- 〈印本文化與南宋陳普詠史組詩〉，張高評撰，台灣大學中文系主編《唐宋元明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大安書局，2005年7月。
- 〈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張廣達撰，《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
- 〈何謂「唐宋變革」？〉，柳立言撰，《中華文史論叢》總第八十一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
- 〈日本天理圖書館所藏所刊《劉夢得文集》流傳概略〉，劉衛林撰，宋代文化國際研討會，成都：四川大學，2006年8月。
- 〈宋刻唐人文集流傳及其價值〉，潘美月撰，國家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印，《屈萬里先生百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6年12月。
- 〈北宋讀詩詩與宋代詩學——從傳播與接受之視角切入〉，張高評撰，《漢學研究》第廿四卷第二期，2006年12月。

# Printing Media and Becoming the newly accomplishment of Song Poetry ——And concurrently theory carving of Tang people Individual Anthologies with model of Song Poetry pursuing

Chang, Kao-Ping \*

[Abstract]

The writers of Song dynasty face to the paragon situation from Tang dynasty. The development of Tang poetry is already replete and essential. The poet of Song dynasty must have to learn the ways from Tang poetry. And they try to change the approach or the meaning, to turn into tactics is conscientious to “Po-Ti” (genre-hybrid technique), devoted to “Chu-Wei” (interdisciplinary technique), engaged in ‘can Tonghua become’, so that they are aspiring for the newly accomplishment. They always except themselves can be distinctive. All this, much and study ten thousand, knowledge is precise and rich in order to use each other. People Song put in order and carve and print such poem collected works of the Tang Dynasty as Tu Fu, Li Bai, Han Yu, Bai Ju-yi, Li Shangying, etc., and Tao Yuan-Ming’s collection, as viewing and emulate and learning the catalyst turned into Tang in Tang of the model; In addition, write this Tibet circulation of copy, abundant pluralism, books of information, then from read, accept, not full to join people Song, and then Zong Fa, becomes, contented newlying, will pass on and finish being successful in a battle with opening up the true quality excellent and long. Print emergence of media, whom books circulate convenient, as to Song poem characteristic formulation, own effect that adds fuel to the flames. In the same way, as to piece give up, tight feather upbraid ‘peculiar to can solve’ since the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custom, and all ‘the battle of the poem of Tang and Song Dynasty’ subjects that Tang poetry laughed at ‘not a poem’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Quia Zhong-shu’s proposal of “Tang and Song poetic demarcation,” and even Naitoo Konan’s “Tang and Song revolution theory,” in Japan, even Cheng Yin-ke and Fu Yue-cheng’s “Song-style culture” can be interpret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rinting technique.

**Keywords** : Printing media, Song poem model, imitation of the Ancient Writes and change Becoming the newly accomplishment, Individual Anthologies and collections about Tang poetry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